臺大歷史學報第 75 期
2025 年 6 月，頁 113–176

BIBLID1012-8514(2025)75pp.113–176
2023.4.11 收稿，2024.10.2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3

從「教化」到「大眾」，及其「轉向」——《臺灣婦人界》的出版者、讀者們與女性形象的生產

顏　杏　如*

提　要

本文考察 1934 年創刊於殖民地臺灣的婦女雜誌《臺灣婦人界》如何在外部環境與內部多重行動者的力量下誕生、轉換路線，並形塑理想的女性形象。

從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社會雙重的視野下可見，《臺灣婦人界》是在日本商業女性雜誌大量輸入臺灣及社會教化運動推行的時代中創刊。在此背景下，該誌強調兼顧大眾娛樂與殖民地教化，但實際上教化多於娛樂的色彩，已無法滿足在帝國版圖的閱讀市場中培養通俗品味的讀者；因此在創刊不久後，便在讀者的力量下走向大眾化。然而，歷經資金困境改組後，與官方合作的資本家夫人成為出版者，致使雜誌再次走回教化路線。隨著時局演進，該誌更與軍方合作，轉向戰爭協力，成為國家總動員的媒體。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該誌呈現了「教化」與「大眾」兩條迥異路線的擺盪拉扯，並產出多樣的女性形象。其中，訴求維護傳統家庭制度的賢妻良母，折射出殖民地社會的邊陲性；培養「勤勞」美德的呼籲，則對應殖民地風氣的「缺陷」。另一方面，讀者來函卻顯露喜愛大眾文藝、關心戀愛議題、追求尊重人格的女性讀者面貌。

本文凸顯了雜誌內容的變化及展現其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在男性媒體人、女性「大眾」讀者、具官方色彩的資本家夫人，以及圍繞著他們的帝國與殖民地雙重磁場中產生。

關鍵詞：女性雜誌　柿沼文明　古賀千代子　商業出版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E-mail: yenhsinju@nt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臺灣婦人界》的誕生：出版者與雜誌的性質
二、讀者的樣貌與力量：走向「大眾」
三、大資本與國家的力量：從「大眾」轉向戰爭動員
結 語

前 言

在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女性與帝國、殖民地之間存在何種相互關係？相對於微觀的、個案的研究，本研究希望透過 1930 年代在臺灣發行的婦女雜誌《臺灣婦人界》（以下簡稱《臺婦》），描繪群體的、集合的女性形象，並探問這些形象如何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雙重磁場中產生。

目前日治臺灣史的研究中，《臺婦》是一份被廣泛運用的史料，從日治時代的女性形象、戰爭時期的女性動員樣態，到育兒知識、摩登都市文化、文學研究等命題討論。[1]不過，在大部份的研究中，根據不同主題的設定，該誌往往被當成佐證的史料，而非分析的對象，其本身的性質、發刊的背景意圖，大抵是被忽略的。其中，有傳播學、文學研究以《臺婦》作為主要的分析文本，例如王湘婷、孫秀蕙以圖像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分析雜誌中的廣告，指出其再現「摩登女性」、「和洋折衷」、「賢妻良母」等形象；[2]王琬葶考察雜誌中的通俗小說，分析文本中性別、

1 不論主題，曾運用《臺婦》當作史料的研究，在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中就有 137 筆資料（2023 年 4 月 3 日檢索），足見其被頻繁利用的程度。

2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孫秀蕙、陳儀芬、王湘婷，〈再現「現代女性」——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的廣告圖像符號研究〉，收入吳詠梅、李培德編著，《圖像與商業文化——分析中國近代廣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 207–231。不過，廣告並非由該雜誌設計，也不僅刊於《臺婦》上。這兩篇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該誌本

臺灣大學圖書館開放資料庫

階級、國族間的關係，以及各種主體身分間的矛盾與差異。[3]不過，這些女性形象如何在 1930 年代中葉以降殖民地政治、社會脈絡的變動中產生，背後涉及哪些力量的交錯作用？又與雜誌本身的發展脈絡、足以左右雜誌內容的編輯方針，以及雜誌中顯現的社群連結，有何種關係？這些問題往往非上述研究的關心，或僅止於初步的考察。[4]整體而言，以《臺婦》本身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往往專注於雜誌中的女性形象，但形象生產與時代脈絡及社會情勢之間的關係卻顯得薄弱。

《臺婦》創刊於 1934 年 5 月，由「臺灣婦人社」發行，廢刊年代不明，現存最後一期為 1939 年 6 月。[5]在目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對於《臺婦》的理解，在不同的研究關心下，呈現多重的樣貌與詮釋——在「統

身的立場與欲傳達的訊息，而是將雜誌上的圖像作為材料，分析女性的樣貌與角色變遷。

3 王琬荸，《世界・民俗・帝國——《臺灣婦人界》小說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本書雖然也簡介該誌編輯、發行概況、欄目內容，及雜誌大致的變化，但並未探討發行背後涉及的各種力量。文學研究尚有 Sumei Wang, “Mass Media and the Modern Girl in 1930s Colonial Taiwan,” and Pei-yin Lin, “Progressive or Immo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odern Girl in Print Media of 1930s Taiwan,” both in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ed. Sumei Wang (Leiden: Brill, 2021), 10–27, 28–45, 這兩篇研究不限於《臺婦》，也併用其他報章媒體，並聚焦於「摩登女性」的形象。

4 王詩芬以 1936 年以前柿沼文明擔任發行人期間的雜誌為線索，探討在臺日本女性的處境與認同，以及雜誌具地方色彩、致力於臺日融合的面向。Shin-fen Wang, “Japanese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in the 1930s: Their Identity 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by Analyzing *Taiwan Fujinkai*,” in *Women in Asia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ed. Tatsuya Kageki and Jiajia Yang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114–32. 鄭涵云以雜誌整體為考察對象，文中對於雜誌的經營與相關人物有詳細整理，但未進一步分析，外部環境與內部社群對雜誌產生的作用力仍待考查。見鄭涵云，〈殖民地臺灣的婦女雜誌《臺灣婦人界》之研究（1934–1939）〉（臺北：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5 「臺灣婦人社」至少存續至 1940 年代。1940 年 7 月，該社曾發行記者泉風浪（1893–?）的《新聞人雜記》（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不過，版權頁上標示為「非賣品」，因此 1940 年以後的「臺灣婦人社」是否仍屬營利性質的出版社並發行雜誌等，則無從判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抵抗」的軸線下，它被視為官方婦人團體發行的雜誌；[6]在與日本女性雜誌的比較下，研究者以其呈現的大抵樣貌，判斷其路線介於菁英與大眾之間；[7]整理臺灣文學集成的中島利郎則指出，該誌是 1930 年代刊登最多通俗小說的雜誌。[8]我們該如何理解《臺婦》同時具有的這些衝突而多樣的面貌？

在思考《臺婦》的性質及女性形象生產的過程時，日本女性雜誌的研究成果提供本文對照的參考座標。牟田和恵運用綜合雜誌及女性雜誌，探討「新女性」、「摩登女性」及「賢妻良母」三者的差異，並指出這三者彼此間相連的構造——媒體、知識分子和國家，在不同意圖和方向性上所形塑的日本女性形象；這三者也都是 20 世紀初，在近代國家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modern」女性。[9]木村涼子解析作為意識形態裝置的婦人雜誌，在近代性別秩序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徵，論證其內在世界由「規範」、「技能」、「幻想」三個面向構成，此乃相應於讀者對於「有益」、「修養」、「慰藉」的需求。[10]由此我們可以注意到媒體與受眾之間雙向的關係，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力量——近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發展所推動的形象產生過程。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體制確立，從 1910 年代中葉到

6 楊翠，《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58。

7 孫秀蕙、陳儀芬、王湘婷，〈再現「現代女性」〉，頁 207–231；王琬葶，《世界・民俗・帝國〉，頁 27、30。

8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の「大衆文学」〉，收入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7　台湾通俗文学集一》（東京：綠蔭書房，2002），頁 349–372。

9 牟田和恵，〈新しい女・モガ・良妻賢母——近代日本の女性像のコンフィギュレーション〉，收入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タニ・バーロウ編，《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帝国・資本・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 151–172。

10 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婦人雑誌と女性たち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0 年代，出版產業成長，雜誌商品化、大眾化。[11]相對於日本產業化社會的脈絡，李承機指出臺灣的報章雜誌等媒體是在政治、社會的機能中登場。日治初期的報紙扮演與政治權力對抗的角色，其後這種對立軸逐漸從「官－民」對抗，演變為 1920 年代的「日本人－臺灣人」，1930 年代後則為「布爾喬亞－普羅大眾」的對抗軸，牽制著殖民地輿論。[12]若將在臺發行的婦女雜誌放入殖民地媒體發展的整體脈絡下思考，在日本本土極具商業、大眾性質的婦女雜誌，在殖民地則因何種時代背景與需求登場？呈現在《臺婦》中的女性形象，又在哪些力量與磁場中產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1919 年底，受到日本輸入雜誌的刺激，《婦人與家庭》發刊，成為第一部在殖民地臺灣發行的商業女性雜誌，顯示女性讀者與閱讀市場的萌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對於「婦人問題」的關注。然而，1920 年代中葉以後，日本商業女性雜誌大眾化，《婦人與家庭》銷量不斷下滑，1925 年以後銷聲匿跡。[13]《臺婦》何以在時隔近十年後的 1934 年創刊？是否緣於 1930 年代殖民地臺灣的讀書市場逐漸成熟並邁向大眾通俗，[14]從而再次為雜誌創辦者帶來契機？又或者交織更複雜的脈絡？

一份雜誌除了懷抱共同關心的出版者、編輯，往往也匯集兼具同質性與差異性的複數執筆者，和樣貌不易捕捉的閱讀大眾；這關乎出版者、執筆者，甚至是讀者的力量如何左右雜誌的樣貌。另一方面，雜誌的發

11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雑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28–29。

12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

13 顏杏如，〈同為「改造」，各自表述——殖民地臺灣商業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的誕生及其女性論述（1919–1920）〉，《新史學》第 31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頁 195–266。

14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頁 25–67；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7–55；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249–290。

臺灣大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行有其意圖，並在特定的時空脈絡與社會結構中誕生。以《臺婦》而言，其發行方針的變化，牽涉該誌誕生的社會網絡、帝國版圖下的讀書市場與殖民地社會內在的結構變遷。

本文將從圍繞著雜誌的外部環境與內部多重行動者，考察《臺婦》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下，形塑出何種女性形象與規範。外部環境指 1930 年代中葉以降帝國空間與殖民地社會的時代脈絡，內部多重行動者則包含了出版者所串聯的人際網絡以及雜誌的讀者們。筆者試圖從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雙重的視野，思考《臺婦》的誕生與意義；並分析出版者的意圖，以及讀者們在反饋過程中，如何左右雜誌的樣貌。透過這些考察，探問在不同力量交會下，女性被賦予的期待與規範，以及殖民地與帝國、國家意識和大眾文化交錯下產生的女性形象。

一、《臺灣婦人界》的誕生：出版者與雜誌的性質

《臺婦》的創辦人為柿沼文明（柿沼二三秋），渡臺年度不明。柿沼 1920 年代曾從事兒童文化的工作，1924 年是「臺灣子供世界社」講演部的成員，曾至宜蘭為公學校兒童講演童話，1927 年更出版童話集《お伽噺集》；[15] 1926 年進入臺南新報社擔任臺北支局的記者，1929 年開始派駐新竹，直到 1933 年離職。[16]原為記者的柿沼文明，為何會在 1934 年創辦一份女性雜誌？

15 〈地方近事　宜蘭〉，《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1924 年 4 月 25 日，第 4 版；〈お伽噺集出版　柿沼二三秋君著〉，《臺日》，1927 年 6 月 10 日，第 3 版。

16 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　大正十六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26），頁 338；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　昭和四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29），頁 292；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　昭和九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33），頁 334。1933 年底出版的《臺灣年鑑》中，臺南新報社的從業員已不見柿沼之名。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臺婦》的〈發刊辭〉中，柿沼指出「內地」輸入的婦人雜誌儘管受到殖民地女性的喜愛，但卻缺乏與臺灣的交集，進而說明發行《臺婦》的動機。我們可將其歸納為以下三點：一、因臺灣風土、氣候、習慣與日本本土不同，輸入的女性雜誌不適用於臺灣，因此希望出版實際有助於臺灣女性、家庭生活之婦人雜誌。二、透過女性雜誌的出版，解決殖民地臺灣的「婦人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包含「打破舊慣」、「內臺融合」、「國語普及」等。三、提供一個在臺灣發表文學、創作的園地。[17]這三點看似都是為了打造一部適合臺灣、立足本地的女性雜誌，其實正顯示《臺婦》創刊之際，該誌所處的內、外部環境。第一點透露商業女性雜誌從日本大舉進入臺灣的閱讀市場，並持續擴張版圖；第二點關聯 1930 年代教化運動的推展；第三點則攸關同一時期文藝大眾化的動向。

讓我們先從創刊初期出版者的角度望去，探問 1930 年代日本帝國空間中女性雜誌的流通，以及在殖民地教化運動推展的雙重脈絡下，《臺婦》何以誕生，其間串連的在臺日本人社群網絡；進而分析在交錯脈絡下發刊的該誌性質，及其所欲形塑的女性形象與規範。

（一）在帝國版圖的閱讀市場下

隨著日臺航路的開通、鐵道的發展、近代郵務體系的導入，報紙、雜誌的流通與帝國版圖的規模同步。[18] 1900 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書店，已出現許多日本輸入的雜誌，其中婦女雜誌的銷售量開始嶄露頭角；192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輸入的商業女性雜誌已是殖民地臺灣閱讀市場上的銷售常勝軍。[19]同一時期的日本，女性雜誌主要由較通俗的《主婦之友》（1917 年創刊）、《婦人倶樂部》（1920 年創刊）獨占市場，其他較早

17 柿沼文明，〈發刊の辭〉，《臺婦》創刊號（1934 年 5 月），頁 11–13。

18 李承機，〈193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收入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恵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頁 241–279。

19 顏杏如，〈同為「改造」，各自表述〉，頁 195–26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創刊、具啟蒙性與道德文化性的雜誌幾乎無法與之競爭。[20] 1920 年代中期到 1930 年代，女性雜誌的發行量更是快速成長。以銷售最佳的《主婦之友》為例，1924 年在日本的發行量為 23–24 萬部，到了 1933–34 年左右更高達 110 萬部。[21]

1930 年代以後，這些大眾化、通俗化的日本女性雜誌，在殖民地的閱讀市場上也持續成長。1933 年，《臺灣新民報》將雜誌分為娛樂、婦人、兒童、經濟等類別，並針對臺北各書店 1 月份的「販賣狀況」進行調查。其中，婦人雜誌的銷售量依次為《主婦之友》6,200 部、《婦人倶樂部》3,800 部、《婦女界》2,000 部、《婦人公論》1,500 部。銷售較好的娛樂雜誌為《國王（キング）》7,300 部、《講談倶樂部》2,700 部；兒童雜誌則為《幼年倶樂部》3,800 部、《少年倶樂部》3,500 部。報導最後提及 6 月份新高堂《主婦之友》的販售甚至凌駕《國王》，是「婦人雜誌的全盛時代」。[22]調查顯示，日本輸入的商業雜誌，依讀者與內容分化；在種類繁多的雜誌中，最受歡迎的都是通俗、大眾路線的雜誌。其中，婦人雜誌不但在閱讀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且持續成長，進入「全盛時代」。

殖民地臺灣第一部商業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即是在日本輸入雜誌的刺激下，於 1919 年誕生。然而，在《婦人與家庭》消聲匿跡後的十年，女性雜誌的銷量仍持續成長，而此時卻沒有在臺灣發行的女性雜誌，這也是柿沼想創辦《臺婦》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實上，柿沼曾任職的「臺灣子供世界社」，正是發行《婦人與家庭》的雜誌社。換句話說，從 1920 年代起，從事兒童文化工作的柿沼便

20 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頁 162–188；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頁 28–29。

21 前田愛，《近代読者の成立》（東京：筑摩書房，1989），頁 155；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頁 54。

22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頁 252–253；〈肩のこらぬ　娯楽もの全盛　島都臺北のみの読書界を打診〉，《臺灣新民報》第 842 號，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5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婦女雜誌產生交集。之後持續從事媒體工作的他，應該敏銳地察覺到女性雜誌市場的持續擴大，這恐怕也是身為記者的他何以創辦《臺婦》的原因。對照 1919 年年底創刊的《婦人與家庭》發刊詞，[23]更可以發現兩份雜誌的共通點：皆提到日本大量輸入的女性雜誌，並強調要出版以臺灣為中心、適合臺灣的雜誌。

《臺婦》在商業雜誌市場持續於殖民地擴張的脈絡中誕生，但也面臨強大的勁敵與挑戰。柿沼形容「婦人公論、主婦之友、婦女界等內地婦人雜誌如洪水般流入書店」，[24]顯見柿沼將這些女性雜誌視為競爭對手。為了與之對抗，1934 年七月號的社告中甚至宣布從次號開始，將出刊日從原本的每月一日提早至前一個月的十日，八月發行的雜誌直接變成九月號。[25]

綜上所述，1920 年代便已接觸商業女性雜誌的柿沼，注意到女性雜誌的銷售量持續擴張，從而意欲進軍這塊市場，但同時也面臨強大的挑戰——如何與日本本土進口的精美廉價雜誌競爭。因此，在〈發刊辭〉中，他不斷強調內地婦人雜誌的知識無法適用於臺灣，臺灣自己的婦人、家庭雜誌才能解決臺灣獨有的問題。次號的雜誌中，他再次重申《臺婦》有內地婦人雜誌無法觸及的領域。[26]換言之，不斷強調「為臺灣量身打造」，其實是推出新商品時，殺出重圍的宣傳廣告詞。

（二）在殖民地的教化運動推展中

儘管意圖瓜分日本輸入女性雜誌在臺灣的銷售版圖這一點，和 1919 年創刊的《婦人與家庭》背景極為相似，但《臺婦》創刊的 1934 年，政治環境已與此前大不相同。192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本土對於各

23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婦人と家庭》創刊號（1919 年 12 月），頁 2–3。

24 柿沼文明，〈創刊號を世に送りて〉，《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72。

25 〈社告〉，《臺婦》七月號（1934 年 7 月），頁 123；《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

26 柿沼文明，〈創刊號を世に送りて〉，頁 72–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社會運動採取壓制的態度；在殖民地臺灣，面對抗日民族運動，總督府也於 1926 年設置文教局，企圖從精神、思想、情感等面向展開對臺灣人的「教化」，內容包含「國語教育」、「內臺融合」等目標。[27] 1934 年 3 月，總督府更與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舉辦「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發表《臺灣社會教化要綱》，訂定指導原則，包含貫徹皇國精神、強化國民意識等。[28]不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多樣思潮湧動的環境，《臺婦》創刊的 1934 年，已是教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也因此，相對於《婦人與家庭》在創刊辭中強調女性的覺醒、擺脫因襲的家庭生活等，《臺婦》強調的是「打破舊慣」、「內臺融合」、「國語普及」等「臺灣本島」的問題，在在呼應文教局的目標。

在日本輸入商業女性雜誌持續成長且日益大眾化，但教化運動也熾烈展開的雙重脈絡下，《臺婦》肩負了另一種使命。前述《臺灣新民報》1933 年調查雜誌銷售狀態報導的同一版面，刊登了一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中山樵（1882–1947）對雜誌界現況的評論，透露官方看待輸入婦女雜誌之態度：

> 婦人雜誌賣得最好，但從我的角度來看，婦人雜誌已遇到瓶頸。因為每號都出很厚關於婦人衛生、育兒、裁縫、其他家計等的附錄，才好不容易刺激一般大眾的購買慾。也因此，前述關於家庭、婦人的單行本完全被凌駕，婦人雜誌本身的內容明顯變得貧弱。例如，最近每部雜誌都詳載報紙上出現的流行話題，以此吸引讀者的好奇心。島瀉博士的女兒解除婚約、三原山殉情事件等，誇張地報導，誇大事實，使得原本就容易動搖的婦人女子心神迷惘。讓我來說的話，今日婦人雜誌有害無益者多，那是由於太過陷於商業化，到了

27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199–217。

28 宮崎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お茶の水書房，2008），頁 144–145；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90–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必須要撲滅婦人雜誌的時期了。[29]

從這段引文可見，當時日本輸入的女性雜誌內容多為實用資訊，以及自由戀愛、殉情等吸引讀者目光的花邊新聞。在中山看來，前者是為了吸引讀者的販賣手法，後者則會為女性帶來不良影響，甚至到了需要「撲滅」的地步。身為圖書館館長中山的評論，反映了當時總督府教育關係者對大眾化女性雜誌的不滿與憂心。

《臺婦》的創刊即是在這篇報導後的一年。創刊號最末〈編輯室〉中，柿沼訴說出版的甘苦過程，也表明雜誌的努力方向：「取材自臺灣的話材、臺灣的問題，製作大眾的雜誌」，但「又不讓教育者之輩皺眉」。[30]換言之，柿沼對雜誌的定位，是具有臺灣特色，同時兼顧「大眾雜誌」及殖民地「教化」的雙重性質。這也顯示《臺婦》的創刊，一方面是在日本商業女性雜誌不斷成長的情勢下企圖進軍閱讀市場，另一方面則是在教化運動展開的時代背景下，為了矯正大眾化女性雜誌過於「敗壞」的風氣而誕生。柿沼在發刊辭中展現要解決「婦人問題」的使命感，正回應了以中山樵為代表的官方文教者之憂心。

儘管柿沼在〈發刊辭〉及後續的文章並未對「婦人問題」進一步說明，但從柿沼的前上司，臺南新報社社長宮本一學（1866–?）[31]為創刊號撰寫的祝詞，得以一窺當時所謂的「婦人問題」，指的是受愛倫凱（Ellen Karolina Sofia Key, 1849–1926）的主張影響，日本社會中充斥著「戀愛中心結婚」、「自由離婚」、「性倫理」等革命性的言論，以及隨之而

29 山中圖書館長談，〈雜誌界は行詰ってる〉，《臺灣新民報》第 842 號，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5 版。引文日文中譯由筆者自譯，下同。

30 二三秋生，〈編輯室〉，《臺婦》創刊號，頁 164–165。在這一期的雜誌中有三篇「我的職場日記」，標記為「柿沼二三秋選」，可以推知「二三秋」是柿沼文明。參照柿沼二三秋選，〈創刊號特別募集　私の職場日記〉，《臺婦》創刊號，頁 90–102。

31 宮本一學 1896 年以軍屬的身分渡臺，之後歷任鳳山縣、臺南縣等各地官廳，1908 年起進入臺南新報社擔任經理（支配人），後歷任專務理事（專務取締役）、副社長，1934 年起任社長。參見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附錄頁 23；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二、人物篇〉，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的各種運動。宮本認為這些運動若偏離「國粹」，結果將令人不安，因此不斷強調「日本精神」是「中正之道」；而臺灣作為殖民地、外地，舊道德、傳統更易被忽視，因此期待《臺婦》能肩負照亮「中正之道」的火炬。[32]這篇祝詞顯示《臺婦》在日本女性雜誌大量輸入之時，同時也是殖民地教化運動展開之際被賦予的使命。

（三）雜誌出版者周邊的在臺日人社會網絡

《臺婦》創刊初期由「臺灣婦人社」發行。該社並非官方社團，也非特定團體或組織的附屬機構，而是由柿沼「個人經營」的雜誌社。[33]換言之，《臺婦》不是為了傳達特定思想而發行的機關誌，而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發行的商業雜誌。

然而，柿沼在創刊過程中，透過在臺日本人之間的社會網絡獲得一些協助。柿沼在〈發刊辭〉中寫道，雜誌創刊之際，給予幫助的人有「民間的大老小松吉久、本島新聞界的大御所蒲田丈夫兩氏」，以及「新竹無盡會社支店長中內猷治夫婦」。[34]小松吉久（1867–?）[35]為總督府評議會員，蒲田丈夫（1893–?）[36]是大阪朝日新聞臺北支局長，兩人分別是實業界、報界的重量級人物。「新竹無盡會社」指的是臺灣勸業無盡新

32 宮本一學，〈臺灣婦人界の發刊を祝す〉，《臺婦》創刊號，頁 9–10。

33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 64。

34 柿沼文明，〈發刊の辭〉，頁 11–13。

35 小松吉久，1896 年渡臺，任職於總督府民政局，後歷任臺北監獄長、彰化廳長、宜蘭廳長。1920 年離開官界後進入實業界，擔任日本拓殖株式會社專務理事，歷任臺灣碳業株式會社社長、朝日製糖株式會社社長。1920 年以後亦曾擔任新竹州協議會員、臺北州協議會員等，1929–1937 年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132。

36 蒲田丈夫，大阪朝日新聞臺北支局長。1919 年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曾任編輯長；大阪朝日新聞創立支局時，曾擔任首任支局長。《臺灣新聞總覽》稱其為臺灣新聞界的「元老株」。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一、新聞興信篇〉，頁 24；〈二、人物篇〉，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竹支店，1933 年 1 月成立，中內猷治為支店長。[37]無盡會社是金融儲蓄、借貸機構，借貸方式類似「標會」。推測原為記者而非資本家的柿沼，創辦雜誌的資金一部分來自這裡。另外，柿沼還提到「役所方面的支持」，從創刊廣告上可以看到「內海忠司」的名字，推測「役所方面」指的是新竹市役所。內海忠司（1884–1968）是新竹州知事，在其 1934 年 11 月、1935 年 3 月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柿沼曾前往拜訪，[38]顯示曾在新竹擔任記者的柿沼與內海建立了私交。臺灣勸業無盡在新竹開設支店時，內海亦出席落成典禮。[39]從這些線索推測，柿沼很可能透過內海獲得人脈上及行政上的支援。這些人物和機構，顯示柿沼身處的媒體界、新竹地方官界、民間實業界，以及三者交錯的「內地人」社會網絡。

駒込武曾描繪內海忠司這位地方長官和「民敕」（民間人但擁有敕任官般影響力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以此討論在臺日本人如何維繫、建構社會網絡，獲得人脈、情報和資源。在內海和《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社長河村徹的往來中可見，內海不僅和身為「民敕」的河村往來密切，也和其他媒體記者保持良好關係。對他而言，媒體既是情報源，也是情報操作和輿論演出的平臺。[40]如果我們將鎂光燈從官員轉向媒體經營者，亦即名不見經傳的柿沼身上，以其為樞軸，可以看到何種依存的相互關係？又在雜誌上放射出什麼樣的光譜？

首先，為《臺婦》創刊號寫「祝歌」者，有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1870–1953）、實業界名人小松吉久；撰寫「創刊祝辭」者，則有愛

37 〈臺灣勸業無盡　新竹支店落成披露〉，《臺日》（漢文版），1933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

38 內海忠司，1928 年渡臺，歷任臺北州警務部長、臺南州內務部長，1931 年擔任臺北市尹，1932 年 2 月到 1935 年 8 月間擔任新竹州知事，後轉任高雄州知事。參見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年譜〉，收入氏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頁 570、591。

39 〈臺灣勸業無盡　新竹支店落成披露〉。

40 駒込武，〈「民勅」との相互依存関係——内海忠司と在台日本人〉，收入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頁 51–7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國婦人會臺灣本部長平塚茂子、《臺日》社長河村徹，以及前述《臺南新報》社長宮本一學。[41]創刊號上的祝歌、祝辭，透露了這份雜誌周邊的人際網絡及呈現的色彩。換言之，柿沼企圖透過教育界、媒體界、婦人團體的重要人物，為雜誌帶來光環與權威。

當柿沼藉由各界重要人物為雜誌背書之時，圍繞著《臺婦》的人際網絡，又期待雜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創刊號多頁的補白點綴著「對本誌的希望與要求」，撰寫者同樣以地方官夫人、教育關係者、報社社長為主，他們寄予雜誌的希望與要求，盡是「婦人教養」、「良妻賢母」與「母性再教育」。[42]這些「希望與要求」，明顯以官方女子教育方針的「賢妻良母」為基調，和日本大眾化的女性雜誌呈現不同的光譜。儘管這是一份個人經營、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雜誌，但是當讀者們打開《臺婦》時，映入眼簾的，卻是教育界、官方婦女團體以及報界重要人物的發言。

換言之，雜誌創辦人柿沼透過身為媒體人的優勢，獲得在臺內地人社會網絡的各種資源，而官方教育關係者、媒體人則透過對雜誌的支持，期望雜誌能改善社會風氣，並將女性拉回「賢妻良母」的基調。

若將《臺婦》放回日本帝國女性雜誌的版圖中，其定位與困境更清晰可見。戰前的商業女性雜誌可分為教養派與實用派兩大潮流，前者以《婦人公論》、後者以《主婦之友》為代表。1916 年創刊的《婦人公論》乃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以擴張女權、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為目的；內容較艱深，讀者以中產階級的高學歷女性為主。相對地，1917 年創刊的《主婦之友》則採取實用主義的立場，以一般家庭主婦為對象，提供實用的生活經驗與技能，同時也符合賢妻良母主義的性別秩序；記事平易

41 幣原坦，〈臺灣婦人界發刊に題す〉，《臺婦》創刊號，頁 4；小松吉久，〈發刊を祝して〉，《臺婦》創刊號，頁 5；平塚茂子，〈祝辭〉，《臺婦》創刊號，頁 6–7；河村徹，〈臺灣婦人界の發刊に寄す〉，《臺婦》創刊號，頁 8；宮本一學，〈臺灣婦人界の發刊を祝す〉，頁 9–10。

42 〈本誌に對する希望並に註文〉（一）～（九），《臺婦》創刊號，頁 25、27、33、35、36、40–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讀者層廣泛。[43]儘管帝國版圖的閱讀市場催生了《臺婦》，但官方卻拒斥其成為《主婦之友》之流的通俗雜誌。《臺婦》在官方人際網絡的支持下，在內容與難易度上皆朝向「教養型」發展，卻又不同於《婦人公論》的自由主義與女權擴張之間的緊密關係，《臺婦》在教化運動的脈絡下，試圖維持「賢妻良母主義」的性別秩序。殖民地臺灣的印刷資本與評論界又未若日本成熟，使得雜誌必須仰賴官界、教育界與內地人網絡，這也成為發展的困境，致使《臺婦》性質不同於一般日本的商業女性雜誌。

（四）在官界、媒體界與教育界交錯下的女性形象

在日本女性雜誌湧入的市場競爭下，柿沼希望「製作大眾的雜誌」，但另一方面，在教化運動推展之際，《臺婦》既同時受到教育界、媒體界、婦人團體等在臺日本人社會網絡的支援，「不讓教育者之輩皺眉」亦為其不可忽視的目標。在兩道相反力量的作用下，《臺婦》究竟呈現何種樣貌？以下，筆者從雜誌整體的概觀，以及最能展現雜誌立場的「論說」，分析在上述磁場中誕生的《臺婦》所呈現的性質與女性形象。

附錄表一為創刊號的目錄。在〈發刊辭〉中，柿沼規劃雜誌內容包含料理、衛生、化妝、服裝等「實用」記事；小說、繪畫、文藝創作等「休閒、娛樂」內容，以及思考殖民地女性、家庭、社會問題等較嚴肅的議題。[44]創刊號的內容也確如柿沼構想，可謂兼顧「大眾」及「教化」的雙重性質。若與 1919 年底創刊的《婦人與家庭》相較，《臺婦》顯得更多樣化且大眾化；不過，與同時期日本輸入的女性雜誌相比，「實用」、「休閒」、「娛樂」等類型的記事無論數量或比重都明顯偏低。

在眾多篇目中，創刊號的兩篇論說，正對應〈發刊辭〉提及的殖民地「婦人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佔醒目位置的第一篇

43 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頁 23–57；岡満男，《婦人雑誌ジャーナリズム》（東京：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1981），頁 87–106。

44 柿沼文明，〈發刊の辭〉，頁 11–1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說，是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長大場孫治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協調〉。大場認為教育攸關國家興隆與文化傳承，而母親肩負子女教育，因此應致力於自身人格的提升。他認為「內地人」子女「厭惡勞動」、「浪費金錢」、「缺乏敬神崇祖之念」，而這些問題起因於殖民地的「缺陷」——「在本島組成的家庭」沒有祖父母，「沒有神棚也沒有佛壇」，且「神社佛閣稀少」，因此家庭教育應致力養成「敬神宗〔崇〕祖」的風氣。[45]大場的論說乃針對「內地人」家庭，他認為在臺日本女性所肩負的「母職」，包含培育具有「實質剛健」品格的兒童，並將以天皇為「宗家」的觀念帶入殖民地家庭，以教育下一代並維持家族制度。其論述顯然由「家族國家觀」所支撐，「母職」的內容亦符合前述宮本所謂的「中正之道」與「日本精神」。

創刊號上另一篇重要的論說為乙守玉緒的〈如何面對在臺內地人女兒的結婚困難〉。乙守是工商學校的教師，也是 1929 年成立的臺北婦人修養會之核心成員，且曾於 1930 年參與女子高等學院的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及高官夫人們關係密切。[46]在這篇論說中，她將在臺日本女性結婚不易歸因於「殖民地風氣的缺陷」。此「缺陷」源自殖民地作為新開地，早期渡航者中混雜許多「想要不勞而獲的人、浮浪者、窮途潦倒者、犯罪後遠走高飛的人」，「女性則以娘子軍（賣春女性）為先遣隊」。乙守認為隨著設施機關的整備，良民良家漸次移住，但居住在臺灣的「內地人」仍遺留奢侈、厭惡勞動、充滿官僚習氣等「缺陷」。她進而討論培養「好女兒」——樸質、健康，並擁有勤勞、刻苦等特質的女性——的對策。此外，她將「打破封建觀念」視為對策之一，然其所謂「打破封建觀念」，與 1920 年代鼓吹自由戀愛、打破階級等訴求不同，而是指消解同鄉、藩閥、「內地」與「外地」之別等地理界線。其主張並非出於平等、自由等價值，而是基於優生學及國家發展上的考量

45 大場孫治，〈學校教育と家庭教育の協調〉，《臺婦》創刊號，頁 19–23。

46 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3 年 12 月），頁 243–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望國家健全發達，民族優美地伸展」。[47]換言之，乙守並非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談論婚姻，而是視婚姻為國家、民族發展的一環。

乙守和大場同樣批評在臺日人「厭惡勞動」。此外，無論是「浮浪者」或「娘子軍」，乙守描繪的都是「不勞而獲」者的形象，與「好女兒」應有的「勤勞」、「刻苦」等特質形成強烈對比。她藉由這些負面形象，提醒身處「外地」的日本女性應培養「勤勞」、「刻苦」等美德。其論述與日本開始邁向帝國之路的 20 世紀初以來，新聞雜誌及教育現場中不斷出現的言論——獎勵「好女兒」向外移動並輔佐男性，以助日本帝國發展——一脈相承。[48]

創刊號這兩篇重要的論說，不約而同地批判殖民地的「缺陷」。大場視缺乏「敬神崇祖」的觀念為問題，企圖打造符合「家族國家觀」的家庭，以及能支持此一家庭制度的女性。乙守則視奢侈之風及投機怠惰為問題，要求女性簡素、勤勞，以助帝國擴張。兩者雖重點不同，但都以天皇制國家的海外擴張為論述展開的前提，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描繪理想的殖民地日本女性與家庭圖像。從兩位作者的身分來考慮，他們的言論不僅透過雜誌發揮影響力，在實質的教育現場也左右在學的女性們。

事實上，在創刊號之後不時可見其他作者提出相似論調，或批評殖民地的女兒們教養不足，太過悠閒；或期待女性能透過教養，達成理想的母性，以培養優秀的下一代。[49]換言之，從「脫離母國」所產生的「缺陷」討論殖民地家庭與女性問題，是當時的教育者、記者們共同的視線

47 乙守たまを，〈在臺内地人娘の結婚難をどうする？〉，《臺婦》創刊號，頁 24–30。

48 20 世紀初以來，雜誌及教育現場這類型的言論，參見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係から〉，收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女性像をめぐって》（東京：青木書店，2007），頁 64–86；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頁 243–294。

49 如：室田有，〈女子は男子に勝る——女子は家庭の大技師なり〉，《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22–26；石垣谷子，〈女學校卒業後に女中奉公をさせませう〉，《臺婦》十一月號（1934 年 10 月），頁 20–21；飯沼龍遠，〈双葉の若芽と子供——理想の母性に立派な兒童〉，《臺婦》十二月號（1934 年 11 月），頁 24–2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在。這些論述基本上都以「賢妻良母」為基調展開，並映照出殖民地的邊陲性，也顯示女性的品格修養與日本帝國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由其而生的理想女性形象。

上述內容從教育界的角度，傳遞官方所欲賦予「內地人」女性的使命及規範，充滿教化的意圖。不過，不能忽視《臺婦》同時也以「大眾雜誌」為目標，在論說之外，亦設有其他文藝、採訪報導等吸引讀者的專欄。其中，由雜誌企劃的內容亦能體現雜誌的立場。相對於教育者所撰寫的論說，雜誌的企劃又呈現何種女性形象，傳遞何種訊息？

不同於以家庭為主要活動場所的「賢妻良母」，「職業婦女」是 1920 年代以後登場，接受學校教育並走出家外，擁有專業技能的現代新女性之象徵。[50]《臺婦》自創刊號起便屢次以此為題規劃內容。創刊號除了刊登三篇企劃募集作品〈我的職場日記〉之外，還有記者親自採訪的〈勞動婦人戰線觀察記〉。[51]在創刊號之後，也陸續以〈女性生活戰線〉、〈女性職場進行曲〉為題，報導職業婦女的工作現場與心境。[52]採訪的對象涵蓋電話交換手、女工、店員、打字員、車掌、護士、美容師、女給、舞女等多樣類型的「職業婦人」。在走入職場的女性與日俱增的背景下，這樣的企劃不但迎合讀者喜好，也是將擁有經濟能力的職業婦女納入讀者群的策略。

然而，記者在撰寫這些報導時，行文重點並非脫離家庭束縛、追求自我、經濟獨立等現代新女性的象徵，而是職場的秩序與工作態度。以

50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

51 本誌記者，〈働く婦人の戰線のぞ記〉，《臺婦》創刊號，頁 52–55；柯劉氏蘭，〈夜更けの店番〉，《臺婦》創刊號，頁 95–97；白樺ゆき，〈タイピストの職場〉，《臺婦》創刊號，頁 98–102。

52 K 記者、M 記者，〈女性生活戰線　臺北菸草工場の卷〉，《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08–111；本誌記者，〈女性生活戰線　銀線を殘してバスは真夏を走る——女車掌さんと語る〉，《臺婦》七月號（1934 年 7 月），頁 142–145；酒井政子等，〈師走の空に描く女性の職場行進曲〉，《臺婦》十二月號（1934 年 11 月），頁 60–7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勞動婦人戰線觀察記〉為例，記者細緻描繪電話交換手專心一致「遠離所有雜念」的「聖女姿態」，制服具「樸素而統一之美」，以及對工作「有責任且決心守護」之精神，並形容安居家中的女兒們「難以想像她們精誠勤奮的樣子」。[53]又如〈女性生活戰線〉採訪臺北煙草工場的女工時，描寫畫著「薄妝」的女工們「以身體整體的節奏，頭腦遠離所有雜念，被一心不亂的精進驅動」，並以「熟練的偉力」操作精巧的機械。[54]當報導女車掌和女司機時，則以「只是勞動」、「在臺北的職業婦女中最勞力的職業」、「工作、工作，一整天直到累壞為止，不斷地勞動生活」等文句傳遞刻苦耐勞的精神。[55]

相似的視線也出現在〈在師走的天空中譜畫女性職場進行曲〉，集中描繪忙碌的身影與工作的辛勞。透過受訪者的敘述，呈現對工作的敬業態度，如忍受無理的要求、過度的勞動、壓抑虛榮心等。與「賢妻良母」形象最遙遠的女給和舞女，則在受訪中吐露從事該行業的家庭經濟因素，以及華麗背後不得已的心境。[56]

從這些描述可見，記者筆下的職業婦女，並非著重於追求自我，提升社會地位，或是經濟自主的特質，而是與此無關的勤勞、忍耐、一心不亂等精神，與前述教育者口中不斷提到「勤勞」、「刻苦」等理想的女性形象重疊。

一些受訪者的回答雖然出現「可以不再被男性看輕」等語，顯露女性追求社會地位提升的意識，[57]然而，雜誌的企劃與記者的敘述方式，以「大眾化」的外衣包裝職業婦女的主題報導，卻也偷渡了官方教育界所欲傳遞的勤勞女性之規範。

---

53 本誌記者，〈働く婦人の戰線のぞ記〉，頁 52–55；柯劉氏蘭，〈夜更けの店番〉，頁 95–97。

54 K 記者、M 記者，〈女性生活戰線　臺北菸草工場の巻〉，頁 108–111。

55 本誌記者，〈女性生活戰線　銀線を殘してバスは真夏を走る〉，頁 142–145。

56 酒井政子等，〈師走の空に描く女性の職場行進曲〉，頁 60–72。

57 酒井政子等，〈師走の空に描く女性の職場行進曲〉，頁 60–7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二、讀者的樣貌與力量：走向「大眾」

嘗試兼顧「大眾」與「殖民地教化」雙重路線，內容多樣化卻也深具官方色彩的《臺婦》發刊後，讀者的評價如何？從出版者角度檢視發刊背景後，也衍生出幾個問題：殖民地臺灣社會的讀者規模是否足以支撐在地發行的女性雜誌？在日本雜誌大量輸入的時代背景下，讀者們的閱讀習慣與喜好為何？她們的偏好與期待又對雜誌產生何種影響？以下將焦點從出版者轉至讀者，探問 1930 年代中葉以後殖民地臺灣女性讀者的樣貌、品味、對雜誌的作用力，及其顯露的女性形象。

（一）《臺婦》的潛在讀者及其輪廓

婦女雜誌在日本熱銷，其背景在於女子教育普及，閱讀人口增加；1920 年代以後，習於購讀婦人雜誌者已從職業婦女、女學生、家庭主婦，擴大至女工、女中等下層的年輕女性。[58]女子教育帶動的識字閱讀能力以及經濟能力帶動的購買力，都是女性雜誌閱讀市場成長的基礎。相對於日本本土，1930 年代殖民地臺灣的狀況如何？

以初等教育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看，《臺婦》創刊的 1934 年，臺灣人女子的就學率是 23.2%，臺灣人男子是 54.44%，在臺日本人女子則是 99%。[59]此外，臺灣全島的高等女學校在學生共 5,660 人，其中臺灣人為 1,586 人，日本人為 4,063 人。[60]這樣的就學率與女學生人數，和日本本

58 中嶌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婦人雑誌、その周辺——『婦人雑誌の夜明け』によせて〉，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婦人雑誌の夜明け》（東京：大空社出版，1989 初版；2016 新装普及版），頁 1–17；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98），頁 212；永嶺重敏，《雑誌と読者の近代》，頁 162–188。

59 詳見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頁 87–88、286。

6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頁 1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在 1907 年小學校女子就學率便已達 96%，進一步升學者更超過 9 萬人的狀況相去甚遠。[61]

不過，若與前一部商業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創刊的 1919 年相較，臺灣具閱讀能力之人口則明顯成長不少。1919 年臺灣人女子的就學率僅 7.36%，臺灣人男子為 32.42%。[62]高等女學校的學生人數從 1925 到 1940 年成長了二倍多。[63]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1930 年代廣設國語講習所，日語解者（懂日文者）的比例增加。河原功指出，1933 年底三省堂的旁系會社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在臺北設立支店，其背景即在於教育機關的擴充、日語解者的增加。[64] 1930 年代輸入的女性雜誌在臺灣得以持續擴張閱讀市場，除了本身的通俗、大眾化色彩吸引更多讀者之外，也與臺灣社會通曉日語者人數成長關係密切。

除了閱讀能力以外，也必須考慮有能力購買雜誌的族群大小。自 1905 到 1930 年，商業、工業、交通業、公務、自由業的人口漸增，都市人口比例也逐漸提高。[65]此外，在臺日本人人口也從 1919 年的 15 萬人（佔臺灣全島人口 4.13%），增加至 1934 年的 26 萬人（5.06%）。[66]

換言之，《臺婦》創刊的 1934 年，儘管殖民地臺灣的女子初等教育未如日本普及，但逐漸增加的女性就學率，以及通曉日語者、日本人人

61 中嶌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婦人雑誌、その周辺〉，頁 1–17；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頁 212。

62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87–88、286。

63 1925 年度，全臺高等女學校本科生在籍學生數總計 3,677 人，其中日本人 2,567 人，臺灣人 1,110 人。1940 年全島在籍生徒數增加至 8,820 人，其中日本人 5,629 人，臺灣人 3,174 人。山本禮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頁 56–57。

64 河原功，〈三省堂と台湾——戦前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流通〉，收入氏著，《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 249–297。

65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171–173。

66 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頁 29–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口與具購買力的都市中產階級成長，都是女性雜誌市場較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幅擴張的原因，而這些族群也成為可能支撐《臺婦》的潛在讀者。

《臺婦》在創刊之初，有意識地設定目標讀者。創刊前，柿沼即委託女學校，詢問應屆畢業生們未來的規劃，並將回答整合成〈畢業後的希望〉刊登在創刊號上。[67]在同一主題的頁面下緣，設有「女學生園地」，作為女學生們投稿、交流的專欄。[68]創刊號中還有〈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訪問記〉、〈我的職場日記〉、〈勞動婦人戰線訪問記〉、〈育兒講座〉，以及刊登童話、童謠的「少年少女」欄，並募集小、公學校學生的投稿（參見附錄表一）。[69]這些內容透露創刊之時設定的目標讀者，包含女學生、職業婦女、家庭婦女，以及仍在小學校、公學校就讀的「少年少女」們。

雜誌發刊後，銷售狀況如何，實際的讀者又是哪些人？《臺婦》的發行量，1934 年不明，1935 年 12 月號為 5,300 部。這樣的數字以臺灣島內發行的雜誌來說，算是不錯的成績。在月刊當中，銷售量僅次於《臺灣教育》（8,687）、《臺灣警察時報》（8,238）、《專賣通信》（8,200），這三者皆是官方或半官半民團體所發行的機關誌。同屬商業雜誌的《臺灣實業界》發行量約 3,000 部，其餘文藝同人誌或學術交流性質的刊物，發行量往往不到 1,000 部。儘管《臺婦》的銷售成績不差，仍遠不及從日本輸入的《主婦之友》及《婦人倶樂部》。與前述 1933 年《主婦之友》在「臺北市」就有 6,200 部，《婦人倶樂部》3,800 部相較，1935 年《臺婦》在範圍更廣的「臺北州」只有 1,570 部，僅超過道德文化性較濃厚的《婦人之友》（14 部）。[70]

在統計資料中，無法得知哪些族群在閱讀《臺婦》，然而透過《臺婦》不定期刊登的讀者來函，能一窺讀者的輪廓與樣貌。茲將來函者所

67 永島節江、蘇氏金蕊等，〈卒業後の希望〉，《臺婦》創刊號，頁 60–65。

68 〈女學生ルーム〉，《臺婦》創刊號，頁 60–63。

69 〈懸賞募集「私の失敗」〉，《臺婦》創刊號，頁 77、286。

70 1935 年以後的統計書，報刊雜誌的發行量以每年 12 月最後一次發行計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年　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九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7），頁 1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示的地點及名字整理如附錄表二。從表二可見，臺灣島內的讀者以臺北、臺中、高雄等大都市最多，不過也零星分布在一些地方都市及郡庄。此外也有日本本土以及大連、廈門等屬於日本帝國勢力圈內的讀者。從姓名來看，97 名讀者中，日本人有 60 位，臺灣人僅 8 位，約佔一成，其餘難以判別。

不過，願意寫信到出版社積極提供意見、抒發感想的讀者，和更廣大、默默閱讀者之性質未必相同。雜誌的懸賞活動應募者，透露更多樣的讀者樣貌。雜誌初期曾在〈兒童專頁（子供の頁）〉推出猜謎遊戲，獲獎者名單整理如附錄表三。[71]從表三可見，獲獎者中臺灣人的比例約佔一半。雜誌在後期陸續有一些性質不同的懸賞活動，獲獎者名單中都可以看到三到五成不等的臺灣人，1939 年的懸賞活動中，臺灣人比例有時更超過五成。[72]換言之，臺灣人讀者的整體比例比表二所見來得高。此外，獲獎者雖以臺北的比例最高，但同樣有來自臺灣南北各地大小城市、街庄的讀者。有些應募者的地址來自營業的店鋪、商家、設施等，不難想見雜誌也可能放在這些場所中供顧客、來訪者閱覽，甚至一些商家可能與雜誌社有合作關係。[73]

從表二和表三可以窺見《臺婦》讀者的輪廓——橫跨臺灣人、日本人、都市與街庄的讀者。從名字推斷的性別來看，《臺婦》的讀者不完全是女性，也有一些男性。一些來函內容也透露男性讀者的身影和閱讀型態，例如「海底電信船南洋丸　胡井春雄」不但在創刊前來函訂閱雜

71 〈懸賞「考へ物」新題〉，《臺婦》七月號（1934 年 7 月），頁 122；〈懸賞新題〉，《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44。

72 〈懸賞〉，《臺婦》新年號（1939 年 1 月），頁 93；〈懸賞〉，《臺婦》二月號（1939 年 2 月），頁 79；〈懸賞〉，《臺婦》三月號（1939 年 3 月），頁 77。

73 例如雜誌中的一些人物照，即在「ミノリ寫真場」中拍攝，攝影師飯島時子亦數次為雜誌撰文，談論如何拍出美麗的照片。此外，雜誌亦曾刊登〈女流寫真師　ミノリスタヂオ〉的廣告，推測同為「ミノリ寫真場」。參見《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18；飯島時子，〈誰でも美人に撮れる——夏の寫眞の寫り方〉，《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24–126；飯島時子，〈氣に入る寫眞　氣に入らぬ寫眞　寫眞師の立場から〉，《臺婦》十月號（1934 年 9 月），頁 104–10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誌，之後更來信描述雜誌在船上極受歡迎，大家爭相閱讀的情景。[74]「南洋丸」是一艘鋪設海底電纜的工作船，[75]船上的工作者主要是男性，顯示對男性而言，《臺婦》成為船上生活的娛樂來源。

（二）女性雜誌的閱讀樣態與品味

儘管殖民地臺灣出現了具有閱讀、購買雜誌能力的人口，然而，《臺婦》是否暢銷，還牽涉擁有閱讀能力的女性讀者們的閱讀喜好，以及雜誌的流通方式與閱讀管道。以下嘗試透過戰後的回憶錄、同窗會報以及口述歷史等資料，描繪統計數字之外，女性雜誌讀者的實存樣態，以及女學生們的閱讀傾向、讀者與讀物之間的關係。

山本禮子在 1993 年針對 1920 至 1940 年代在臺灣就讀高等女學校的畢業生們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女學生們閱讀的雜誌、書籍十分多樣，其中，雜誌排名依序為《婦人倶樂部》、《少女倶樂部》、《主婦之友》、《國王》、《少女之友》、《講談倶樂部》，回答中還可見《婦人公論》、《中央公論》等等。[76]可以看到女學生們的閱讀偏好以大眾通俗路線的雜誌為主，啟蒙教養型雜誌相對較少。

除了雜誌之外，漫畫、小說也是女學生們的愛讀物，不少單行本原都來自雜誌上的連載。1939 年進入第二高女的力武和子，回憶在學期間擔任圖書部員時，喜愛閱讀的書物是《野良黒（ノラクロ）》[77]、《冒険

74 〈發行前既に此の人氣〉，《臺婦》創刊號，頁 156–157；〈おたより〉，《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56–157。

75 遞信省工務局編，《遞信省海底電線布設船南洋丸建造概要》（東京：遞信省工務局，1926）。

76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頁 118–158。山本主要利用同窗會名簿進行抽樣調查，因此包含日本人與臺灣人，但以臺灣人就讀的三高女為重點調查對象。

77 田河水泡（1899–1989）的漫畫，1931 年在講談社的《少年倶樂部》連載，以擬人化的流浪狗為主角，描繪其在軍隊中的出世物語，反映軍國的世相，並帶有諷刺意味。之後亦出版單行本，是當時的暢銷書。關於「野良黒」受歡迎的程度及影響，參見鄭麗榕，〈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歷史學柑仔店》，2015 年 9 月 25 日，2023 年 3 月 10 日檢索，https://kamatiam.org/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

臺灣人學與你的資訊庫

ダン吉》[78]之類的漫畫以及少女雜誌。[79]這兩部皆是 1930 年代刊登在《少年俱樂部》上的連載漫畫，廣受兒童、青少年歡迎。1944 年自第一高等女學校畢業的山崎（水間）慶子回憶學校有藏書可觀的圖書室，她曾借閱吉屋信子的《花物語》。[80]吉屋信子（1896–1973）是大正、昭和時期少女小說、家庭小說的代表作家，曾發表多篇作品在少女雜誌上，1917 年開始連載的《花物語》更獲得少女讀者的青睞，與菊池寬並稱大眾作家的第一人。[81]這些都說明了 1930 年代之後女學生們閱讀的偏好已越來越大眾化、通俗化。

女性雜誌讀者的教育程度並不限於受高等女學校以上，受公學校初等教育的女性亦是潛在的閱讀大眾，閱讀的管道也不僅止於訂閱。鄭鴻生描寫僅受過公學校教育的母親走過的 60 年洋裁歲月，其洋裁啟蒙正是女性雜誌。鄭母施傳月，1918 年出生於臺南西門外五條港一帶，父親經營雜貨店。傳月還在就讀公學校的 1920 年代末，雜貨店遭逢經濟不景氣，經營艱困，她必須幫忙照顧店面，畢業後也未能繼續升學。當時，店裡用來包裝顧客商品的紙袋，是向舊紙商收購的舊報紙、雜誌黏製而成。其中，「有一類舊雜誌引起母親的注意。那是附有洋裝設計圖的日文婦女雜誌，像《主婦之友》或《婦人俱樂部》之類，都是住在臺南的

78 1933–1939 年在《少年俱樂部》連載的島田啟三（1900–1973）之漫畫，描繪漂流到熱帶「蠻人島」的ダン吉在黑鼠的幫助下，成為「蠻人島」之王的故事，當時是兒童們熱衷的人氣漫畫。漫畫中呈現「發現野蠻」—「自覺並帶入文明」的構圖。參見川村湊，〈大衆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アジア認識〉，收入川村湊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7　文化のなかの植民地》（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 107–136。

79 力武和子，〈恩師の思い出〉，收入撫子会編，《遠き学び舎：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のあゆみ》（東京：台北第二高女撫子会，1994），頁 206–208。

80 慶子是「第 38 期生」，期生的計算上推至國語學校第三附屬高等女學校，第一期生是 1907 年的畢業生，因此推算山崎是 1944 年畢業。「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編集委員会，《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藤澤：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同窓会みどり会，1998），頁 12–14、115。

81 江刺昭子，〈吉屋信子〉，《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デジタル版（東京：小学館，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家庭主婦看過不要的。」[82] 16–17 歲起，傳月開始依著雜誌上的洋裝圖版，學起裁縫製衣；公學校畢業的識字能力，讓她在嘗試中摸索，提升了日文閱讀能力。19 歲時，她進入日本人開設的洋裁店「日吉屋」工作，之後到日本學洋裁設計，回臺後開設洋裁店，一路到戰後的 1990 年代。鄭鴻生形容：

> 那些原來是店裡用來黏貼紙袋子的日文現代婦女雜誌，竟成了她企盼一個獨立自主新世界的啟示。不僅是雜誌上的洋裝人物與圖樣，還有其他更多現代婦女的各種生活知識與規範也都來自這些婦女雜誌。[83]

從施傳月的例子中可以觀察到幾點。首先，女性雜誌的讀者不限於高女，受過公學校教育、擁有日文閱讀能力者，都是可能的讀者。其次，傳月公學校畢業於 1930 年代，正是日本女性雜誌大量輸入殖民地臺灣的時期。女性雜誌透過舊書報回收買賣的方式成為雜貨店的包裝紙，並再度成為讀物，表示「訂閱」的數量相當可觀，才有可能以這樣的形式流傳。傳月的例子還透露，閱讀的管道未必透過「購買」，有時也可能以回收再利用的迂迴方式，抵達讀者手中，甚至成為左右生涯的讀物。

透過舊報紙回收、接觸女性雜誌的例子並非僅見於施傳月。筆者訪問的朱蔡麗容女士（1932 年生），父親在大稻埕經營雜貨店，她亦提到接觸書籍、雜誌的方式是家中為了做紙袋而向回收商購買的舊書報。她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若在準備做成紙袋的舊書報中看到自己喜愛的小說，便會將之留下。回收的舊書報中也有《主婦之友》、《主婦〔婦人〕俱樂部》、《少年俱樂部》等雜誌，[84]麗容表示這些雜誌多來自日本人家庭，臺灣人買不起。筆者翻閱同一時期的《主婦之友》、《婦人俱樂部》，「懸賞欄」中居住在臺灣的得獎者幾乎都是日本人，顯示購讀

82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印刻文學，2010），頁 42–52、55。

83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頁 63。

84 朱蔡麗容女士戰爭末期進入第三高女就讀（最後一屆），當時最愛閱讀的是《福爾摩斯》、《亞森・羅蘋》等等。（2017 年 2 月 19 日訪問）

臺灣人學日治期刊資料庫

者的族群。

不過，在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到臺灣人家庭購讀兒童雜誌、女性雜誌的例子。1940 年進入建成小學校就讀的陳淑君，父親在太平町經營流行衣帽貿易，十分喜愛書籍，曾為年幼的子女訂購《幼年倶樂部》、《少女倶樂部》，為母親訂購《婦人倶樂部》、《主婦之友》、《國王》等雜誌，[85]顯示一些較為富裕的中上層臺灣人家庭亦會訂購大眾商業雜誌。讓女子就學的臺灣人家庭，通常有一定的階層優位性和經濟能力。[86]換言之，進入公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的女兒們，不少來自具購讀雜誌經濟力的家庭，但是「訂購」的決定權，往往在父親手上。

另一方面，李承機的研究顯示，許多人接觸報章雜誌未必是「購讀」，而是透過圖書館和新聞縱覽所的「輪讀」。1920 年代，圖書館的利用者逐漸增加，臺灣人社會也出現「讀書熱」，特別是進入 1930 年代，全島的公私立圖書館多達 83 間，1934 年利用者高達 126 萬人次，平均每天將近 3,900 人次。[87]以 1933 年的臺中圖書館新聞室為例，館藏的 30 多種雜誌中，最常被閱讀的是《中央公論》、《講談倶樂部》、《國王》、《主婦之友》、《婦人公論》。[88]可以看到圖書館的「輪讀」是重要的閱讀管道，大眾女性雜誌是最受歡迎的雜誌之一。

以上討論顯示，接受初等學校教育的女性，擁有閱讀日文書刊的能力，也是閱讀族群的一部分。此外，雜誌流通的管道除了訂購，也可能透過舊書報回收、圖書館借閱、相識的同儕之間傳閱等多樣的方式，在

85 陳淑英提供，〈古きよき日々と父母を偲んで　25 期陳淑英の亡き妹故陳淑君（第三高女が第二女中に変った第一期生）の遺書より〉，《台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會報》（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2015），頁 152–159。（朱蔡麗容女士提供）

86 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 156–157。

87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頁 227–230。

88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頁 253；〈讀書力を示す臺中圖書館の成績〉，《臺灣新民報》第 991 號，1933 年 11 月 22 日，第 6 版。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特定的讀者之間輪讀。[89]另一方面，「購讀」的族群，以日本人為主，臺灣人的比例較低；但透過圖書館等「輪讀」的管道，其「讀者」人數遠多於統計數字上的發行部數。

（三）讀者的聲音：向「大眾」靠攏的力量

隨著 1930 年代女子教育的成長、國語講習所的設置，擁有閱讀能力者增加，但讀者的品味也相當大眾化。對這些讀者而言，嘗試兼顧「大眾」與「教化」雙重路線的《臺婦》接受度如何？讀者們的品味與喜好是否對雜誌產生影響？

從創刊之後的讀者來函，得以一窺讀者的關心，以及對雜誌的看法：

> 恭祝臺灣婦人界發行。對豐富內容感到佩服，但是小說還是加入插畫會比較好。卷頭繪加入人物照片五六張會更美。家庭訪問、經驗談非常好。
>
> 我興味盎然地拜讀了這個月的共婚座談會，今後也希望多發表。外國人所見的臺灣批評座談會也會很有趣，但希望以女性時評、社會問題為主，為臺灣女性撰寫。
>
> 料理講座，希望不都是那些在收音機中聽到的女學校教師，懇請提供公認的市內美味料理的料理屋之秘訣、家庭料理的方法等。
>
> 此外，也請將視線望向臺灣婦人，互相教導優點，採取讓所有臺灣女性前進的方法（臺北市　悅子）[90]

從來函可見，讀者最感興趣的內容是家庭訪問、座談會、料理等具實用性及貼近生活的內容，並期待增加插畫、卷頭照片等娛樂的元素。從行文中的「指導」語氣，透露其對婦女雜誌的熟悉度，很可能平常即是日本婦女雜誌的讀者，也在比較之下認為《臺婦》缺乏插圖、照片。同號雜誌上也有其他讀者表示希望能刊載「適合年輕女性的讀物、小說」、

89 有時雜誌未必是「個人」購買，而是「大家」出錢購買，輪流閱讀。〈家庭の讀物を語る座談會〉，《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29。

90 〈おたより〉，《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4–16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加入更多漫畫」等等的期望。[91]

如前述中山樵透露的憂慮，同一年代最受歡迎的《主婦之友》、《婦人倶樂部》等大眾化女性雜誌，佔絕大篇幅的是夾雜插畫的通俗小說、娛樂演藝消息，以及關於疾病治療、家計、儲蓄等實用資訊。致函《臺婦》的讀者很可能早已接觸這類型的日本婦女雜誌。在這樣的閱讀品味下，不難想像她們認為《臺婦》太過教條，缺乏娛樂消遣。換言之，隨著接受近代教育，女性成為文化出版品的消費者，而大眾化商業雜誌的輸入，也培養了她們的喜好與品味。採取兼具教化路線的《臺婦》，已無法滿足女性讀者的喜好與期待。

編輯也從這些聲音，確切感受到讀者將《臺婦》與日本輸入的婦女雜誌放在同一天枰上比較，從而決定更換封面設計，以免處於「被比較」的位置。[92]此外，原在創刊號中預告的內容，如〈女學校畢業生的讀物何者適當〉（由臺北第三高女校長小野正雄撰稿）、〈警察給家庭的話〉等明顯生硬、官方色彩濃厚的文章，最後並未刊登於次號的雜誌中。[93]版權頁的〈編輯室〉中解釋道：「創刊號所刊出的預告，在本號中未刊出者，乃因一般讀者的聲音而改變編輯方針，這一點尚請諒解。」[94]顯示讀者的喜好與期待開始改變了《臺婦》的內容與路線。

面對讀者希望刊登「適合年輕女性的讀物、小說」的要求，記者回應「七月號開始會請內地的大師執筆精彩的『小說』，目前交涉中，一定會刊登符合您期待的小說」。[95]七月號開始刊登大野倭文子撰寫的長篇小說〈天空赤紅（空は紅い）〉，每隔兩、三頁便加入插畫，並對作家介紹如下：

被視為現代女流文壇的新太陽大野倭文子女史，是女子大學出身的

91 〈おたより〉，《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4–165。
92 〈編輯室〉，《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6。
93 〈次號の主なる内容（決定せる分）〉，《臺婦》創刊號，頁 16。
94 〈編輯室〉，《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6。
95 〈おたより〉，《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4–16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才媛，其麗筆已被內地一流的新聞、雜誌稱頌。

女史這次為本誌，以新戀愛為主題，交織婦人運動家、女流作家、職業婦人的興味，寄來充滿波瀾的大作。

特別是作者為女性，且是女性最高學府的女子大出身的菁英，女史之筆描寫女人的心理近乎完美。

本篇乃橫亙十餘回的長篇，請永遠愛讀。[96]

這段介紹文不斷強調作家是在「內地」受肯定的女性作家、女子大出身的菁英，主題是戀愛且交織婦人運動家、女性作家、職業婦女等元素，足見編輯試圖迎合女性讀者的閱讀偏好。

讀者的聲音，使雜誌路線逐漸從官方傳聲筒的角色，朝向大眾化雜誌發展。這也與雜誌經營的性質關係密切——個人經營，以營利為目的。儘管《臺婦》創刊之初背負教育界、官方婦人團體以及媒體界的期待，但作為一本商業雜誌，無法不考慮讀者的偏好。此外，雖然柿沼仰賴其能力所及的在臺日本人社會網絡，但並不意味雜誌的內容與營運方向受其干涉。

若比較創刊一年半後的雜誌，可以清楚看到在讀者的作用力下，雜誌風格大幅轉變。如附錄表四所示，創辦初期濃厚的教化色彩在 1935 年九月號中已相當淡薄，僅存在一些時事性質的殖民地社會相關訊息；教化團體、女子青年團、愛國婦人會等活動報導未見於本號。而躍居篇幅之最的則是文藝創作，其中又以大眾小說最多，讀者投稿的懸賞作品亦不少。此外，雜誌還刊登各式的女性身影、明星八卦，以及深受女性歡迎的吉屋信子的譯詩。

值得注意的還有，該號唯一的一篇論說是安部磯雄（1865–1949）的〈新時代的婦人〉。安部是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1910 年代以後積極參與婦女解放運動，認為女性和男性擁有同等的權利；他主張自由戀

96 大野倭文子、小寺耕嶺畫，〈空は紅い（一）〉，《臺婦》七月號（1934 年 7 月），頁 3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也支持女性應接受高等教育、經濟獨立，並擁有參政權。[97]安部在〈新時代的婦人〉中，描述德國政府為了救濟男性失業，要求婦女回歸家庭；對此他認為將婦人的活動領域限於家庭，對婦人自身及社會而言，未必是幸。他秉持 1910 年代以來的立場，支持婦人活躍於社會，並賦予選舉權，使之參與政治。[98]《臺婦》刊登安部的文章，其色彩明顯異於創刊之初的幾篇論說。

整體而言，《臺婦》的性質已褪去明顯的教化色彩，變身為大眾化的商業女性雜誌。而此變化並非一朝一夕，如同前述，在接受讀者「期待」、「指導」的聲音之後，該誌便刪去具官方生硬色彩的篇目，並逐漸增加小說、插畫、照片的篇幅，「實用」、「休閒」、「娛樂」的色彩大幅提高。此外，《臺婦》從 1935 年開始開設〈女性境遇商量（女性身上相談）〉專欄，讓讀者投稿關於婚姻、就業、生涯抉擇等各種煩惱，並由雜誌社的「女性身上相談部」提供諮商意見。[99]同號雜誌也以「為了本島文化」之名，邀請日本著名的媒體人清澤洌（1890–1945）、女性教育家正田淑子（1877–1942）和婦人運動者高橋千代（1890–1969）來臺巡迴演講，並與兒童藝術聯盟合辦「說話會」，內容包含了童謠舞蹈、兒童劇等。[100] 1935 年以後，論說欄位也出現介紹歐美世界各國婦人運動

97 安部磯雄著有《婦人の理想》（東京：北文館，1910）、《子供本位の家庭》（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17）、《産兒制限論》（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22）等書。參見坂本武人，〈安部磯雄の婦人論〉，《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第 13 期（1968 年 3 月），頁 92–122。

98 安部磯雄，〈新時代の婦人〉，《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12–13。

99 此專欄一直到 1936 年六月號為止不定期出現，表四的 1935 年九月號中亦可見。〈女性身の上相談部の設置〉，《臺婦》十二月號（1934 年 11 月），頁 174；責任回答者　嫩葉，〈女性身の上相談部の設置〉，《臺婦》新年特別號（1934 年 12 月），頁 166–172；禾禺隱士　責任解答，〈女性身の上相談〉，《臺婦》六月號（1936 年 6 月），頁 157–168；〈女性身の上相談〉，《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75–78。

100 〈聽け・明日への叫び〉，《臺婦》新年特別號（1934 年 12 月），頁 74–75；〈兒童藝術聯盟と臺灣婦人界とのタイアップに就て〉，《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40；〈「お話會」のお知らせ〉，《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48。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文章。[101]

「人生境遇商量」自 1910 年代中葉開始便已常見於日本女性雜誌上，而舉辦手藝展覽會、講演會、音樂會等活動，則始於 1920 年代的《主婦之友》，其手法不但獲得成功，也影響其他的婦人雜誌。社會心理學者南博認為這是將讀者組織化、系列化的販賣手法。[102]「說話會」的舉辦，則與柿沼過去從事兒童文化的活動有關。[103]

《臺婦》諸多的安排與變化，皆是仿效自日本女性雜誌的商業手法，一方面迎合大眾的口味，一方面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然而矛盾的是，《臺婦》在創刊之際強調要解決臺灣獨有的問題，卻不敵銷售壓力，而趨近日本輸入的大眾化商業女性雜誌；起初雖高舉「本島文化」之旗舉辦活動，最終卻仰賴「內地」名人來凝聚讀者，也再次顯示在殖民地經營女性雜誌的困境。

另一方面，回應讀者的建議，卷頭照片增加，活躍於不同領域的女性身影也出現在雜誌中。在雜誌內容改變後，讀者們也從過去「指導」、「期待」的聲音，轉變為稱讚之詞，諸如：「拿到七月號，內容變得非常好」；「七月號的封面很棒，令人驚豔。我等的婦人界成長到這個地步，很想像抱緊愛兒那樣地疼愛」，甚至有非「訂閱」戶的讀者，形容自己跑了好幾次書店才買到雜誌的引頸期盼之情。整體而言，多是對雜

101 除了安部前文外，尚有青山學院教授小泉郁子，〈ファッシヨに抗する婦人運動〉，《臺婦》六月號（1935 年 5 月），頁 34–38。

102 岩見照代監修，《「婦人雜誌」がつくる大正・昭和の女性像　第一巻　恋愛、結婚 1》（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頁 vi–xi；齋藤美穂，〈婦人雜誌における身の上相談〉，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大正期の女性雜誌》（東京：大空社，1996 初版；2016 新裝普及版）。南博、社會心理研究所，《大正文化 1905–1927》（東京：勁草書房，2013；1965 年初版），頁 334–338。

103 1935 年 9 月開始的「說話會」在舉辦兩次後，11 月因始政博覽會而暫停，其後柿沼文明過世，1936 年 4 月雜誌曾再次公告會以祝福天長節之名舉辦，卻無下文。〈お話會のこと〉，《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43；〈「お話會」のお知らせ〉，《臺婦》十二月號（1935 年 11 月），頁 44；〈お知らせ〉，《臺婦》四月號（1936 年 4 月），頁 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誌表達讚美、喜愛之辭，但仍有讀者在稱讚之餘，希望能再多刊登一些小說、輕鬆小品或裁縫等實用性的文章。[104]

讀者來函顯露女性讀者偏好大眾文藝、娛樂消遣、實用性的記事，而她們的喜好與聲音，也左右了雜誌的內容與路線。讀者來函同時折射出另一個實存的女性身影——接受近代教育，擁有閱讀能力與習慣，並在商業雜誌成長流通的背景下養成通俗、大眾品味的女性讀者們。

三、大資本與國家的力量：從「大眾」轉向戰爭動員[105]

（一）介入的大資本

從 1935 年 9 月號開始，雜誌的版面從小開本（A6）變成大開本（A5），價格從 20 錢提高為 40 錢；[106]社址從西門町三丁目移轉到本町一丁目——城內醒目的大道上，並興建了一棟三層樓宏偉的鋼筋水泥建築作為新社屋。[107]不過，雜誌社的擴張，並不是基於經營的利潤，而是借款及外部資金的挹注。同時，臺灣婦人社變更為「株式會社」，柿沼

104 〈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八月號（1935 年 7 月），頁 102–103；〈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90–91。

105「轉向」一詞，在日本現代史中，最狹義指 1929 年之後，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因掌權者的壓力而放棄其原來的政治思想。本文篇題及本節中的「轉向」，一方面為中文語意中的改變方向；另一方面，雜誌內容雖非由左至右轉換，「大眾」也非「無產階級大眾」，而是具通俗品味的讀者「大眾」，但從討好「大眾」的路線往戰爭動員切換的過程，同樣有著來自掌權者的壓力，以及往集體主義靠攏的現象，「轉向」亦包含了此一層意義。

106 不過，大開本的雜誌只維持了四期（1935 年九月號～十二月號）。

107 《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11、版權頁；《臺婦》八月號（1935 年 7 月），版權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此號雜誌為「躍進號」，並言這是雜誌第三次改變形態。[108]

事實上，《臺婦》在創立近一年的 1935 年 3 月、4 月，曾因經營不善休刊兩個月。也因為雜誌社的頓挫，1935 年 3 月起出現募資的建議，並仰賴友人資金的援助。5 月復刊時，雜誌的販售價格從原來的 40 錢降為 20 錢，並設立代理部（後改稱「商事部」），「選定適合臺灣風土氣候的良品」販賣，商品包含女性用品、化妝品、藥品、家庭用品等等。[109]這些改變，都是為了改善經營困頓。柿沼稱 1935 年五月號雜誌為「改造號」，並「希望今後以一家一冊為目標，藉由編輯的精銳化、經營的合理化，推出對大眾而言是良友的《臺灣婦人界》」，且樹立「一萬部發行計畫」，顯示過去經營的狀況並不如預期。[110]價格的降低，透露大眾化的企圖；設立「商事部」販賣商品，亦是仿效日本內地婦女雜誌的經營手法。然而，上述嘗試亦未能改善收支，《臺婦》只好另求他法，附錄表四的 1935 年九月號為「躍進號」，是雜誌再次大眾化後的樣貌。

雜誌社經營困難，有多重原因，一方面臺灣社會並沒有像日本本土擁有廣大的讀者，其次是面臨日本輸入雜誌的競爭，再加上柿沼錯估情勢，過度擴張——雜誌創刊三個月後，便陸續在基隆、臺南、大連、羅東、花蓮港設置支局，在臺中設置「通信部」，[111] 1935 年又增設商事部、印刷工廠等等。

從這些線索可知，1935 年 9 月，《臺婦》改變出資、經營的方式，是因為營運困難。根據 1935 年十月號刊登的〈臺灣婦人社創立總會速紀錄〉，雜誌社兼營的商事部與印刷工廠並不順利，因此決定募集股票，

108 柿沼文明，〈躍進號に題す〉，《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10；〈臺灣婦人社創立總會速記錄〉，《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92–93。

109 柿沼文明，〈改造號に題す〉，《臺婦》五月號（1935 年 4 月），頁 25；〈商事部便り〉，《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101–103。

110 柿沼文明，〈改造號に題す〉，頁 25；〈編輯室〉，《臺婦》五月號（1935 年 4 月），頁 80。

111 〈社告〉，《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93；〈社告〉，《臺婦》十月號（1934 年 9 月），頁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立株式會社，其中部分股票甚至用來彌補柿沼未匯款的債券，顯示經營虧損。在這次雜誌社改組後，柿沼交出經營權，社長由選舉產生的古賀千代子擔任。[112]

古賀千代子是古賀三千人的夫人，東京府立高女出身。[113]古賀三千人（1869–1937）是臺灣商工銀行董事長，活躍於在臺日人社會，除了出身於實業界，身兼多家公司的社長、董事，擁有龐大的資本，也跨足政界，曾擔任高雄州協議會員、總督府評議會員。[114]古賀三千人也是柿沼曾任職的臺南新報社的董事，或許是這一層關係，在《臺婦》經營不善而希望募集女性股東時，便由夫人千代子之名出資。身為大資本家夫人的千代子，在股東會議後的選舉中當選社長。至此，《臺婦》從個人營運，轉為株式會社，表面上是女性擔任社長，實際上由大資本支撐。

1936 年 1 月 3 日，《臺日》刊載《臺婦》的主幹柿沼文明於 1 日逝世的消息。[115]根據《臺灣新聞總覽》，柿沼應是自殺。[116]柿沼過世後，《臺婦》停刊一個月又再度復刊。[117]

雜誌社改組和社長交替後，雜誌社的人際網絡也出現變化。新社長古賀千代子代表的是在臺日人資本家夫人／上層社會的女性，並且與官界極為靠近。古賀就任社長時，邀請了總務長官、帝大總長夫人、文教

112〈臺灣婦人社創立總會速記錄〉，《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92–93。

113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二、人物篇〉，頁 16。

114 古賀三千人，1896 年春渡臺，最初從事土木工事承包，之後兼營製腦、製糖、製冰等各種事業。高雄是其發跡地，曾組織內地人組合，設立高雄公會、高雄商工會、高雄信用組合等，並長年（1907–1932）擔任高雄商工會長。此外，他曾於 1920 年任福岡縣選出的眾議院議員、高雄州協議會員，1921–1935 年擔任總督府評議會員。1934 年，他除了擔任臺灣商工銀行董事長，還兼任臺灣貯蓄銀行、臺灣煉瓦株式會社、高雄土地株式會社、臺南新報株式會社的董事，同時是臺灣爆竹煙火株式會社、臺灣鐵道株式會社的社長。參見〈故從六位古賀三千人氏を悼む〉，《臺婦》五月號（1937 年 5 月），頁 8–12；臺灣新民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頁 72。

115〈柿沼文明氏〉，《臺日》，1936 年 1 月 3 日，第 7 版。

116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一、新聞興信篇〉，頁 64。

117 藤瀨徹治郎，〈臺灣婦人界二月號の休刊の後を享けて〉，《臺婦》三月號（1936 年 3 月），頁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局長夫婦參加宴會，文教局長致詞時，期許《臺婦》能達成社會教化的使命。[118]此外，古賀就任社長後的隔月，該誌上刊有永井柳太郎（1881–1944）、文部大臣松田源治（1875–1936）、拓務大臣兒玉秀雄（1876–1947）、內務大臣後藤文夫（1884–1980）等人的致電及祝詞。[119]圍繞雜誌的人際網絡，已從柿沼擔任社長時的民間記者、教育者、地方層級的官僚，向上延伸至總督府及中央官界的層級。

（二）在大資本和官方人際網絡中誕生的女性形象

雜誌經營權和人際網絡的變化，再次影響雜誌的走向。在古賀就任社長後發行的 1935 年十月號上，總編輯藤村志郎在〈臺灣婦人界將往何處去〉中，強調雜誌的使命在於喚起女性「作為女兒」、「作為母親」，及其在「家庭」中的角色，透露編輯方針的轉換。[120]

這篇文章也預告了後續該誌方向一點一滴的改變。儘管雜誌仍維持原有的大眾元素，並增設「愛讀者文藝」欄；[121]但另一方面，論說的比例再次提高，且不斷強調日本傳統與家族制度，及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1935 年十一月號上喜多收一郎（1889–?）的〈日本婦人和日本精神〉，以天皇為頂點的家族國家觀為基礎展開論述，並強調女性母職的角色及「犧牲」的精神。喜多視「戀愛至上主義」為「外來思想」，會「傷害日本固有傳統的精神」，應加以排斥，以維護構成國家的家族制度。此外，他認為日本女性的特殊性在於犧牲的精神；由強烈母愛養育的孩子也會養成「為了君國，有身如鴻毛」的犧牲精神，而這也是「建國的基礎，國體的精華」。[122]

---

118 古賀千代子，〈感謝と感想〉，《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17。

119 《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18–19。

120 藤村志郎，〈臺灣婦人界は何所へ行く〉，《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11。

121 《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65–72。

122 喜多收一郎，〈日本婦人と日本精神〉，《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12–14。喜多收一郎，1911 年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1916 年進入大阪時事新報社，曾留學英國、歷訪歐美。1927 年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社高松支局長，1933 年起就任大阪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1936 年一月號，靜修女學校鈴木讓三郎的〈從國史所見的我國之家庭〉，同樣視自由戀愛為社會的「惡風」，並強調以皇室為中心的日本家庭制度。鈴木認為，日本的家族制度儘管歷經了由大家庭變遷至小家庭的過程，但以皇室為中心這一點始終不變，並強調家族的本質包含「確立祖先崇拜」、「守護（家庭）避免來自社會的惡風」等重要元素。[123]

以家族國家觀為基調的論說，自創刊初期便已出現，但僅止於批判殖民地風氣的「缺陷」，尚未如此強調對天皇、國家的獻身，以及在「傳統」家庭制度中「犧牲」的女性特質。此外，這兩篇文章共通的論旨之一，皆在於使女性遠離外來思想「戀愛」所帶來的「惡風」，防止女性逸脫傳統家庭制度的正軌。這也是官方教育者們自創刊之初即抱持的期待——將女性導回「中正之道」。這類型的論說，在雜誌改組之後明顯增加。

另一方面，女性們關心的戀愛、婚姻、就業等議題，仍以散文等各種形式出現在雜誌中。雜誌甚至策劃以學校畢業生為對象的「女性就職座談會」，邀請男性主事者們介紹求職的技巧與薪水等。[124]各式各樣女性的身影也持續出現在雜誌上，除了教師、產婆等常見的職業外，還可以見到投身新興媒體的播音員、活躍於運動界的選手。[125]雜誌的卷頭照片，依然可見電影劇照、捲燙短髮，或身著流行旗袍、高跟鞋的時髦女

每日新聞社臺北支局長，1936 年之後任職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109）撰寫這篇文章時，喜多的身分未明記於雜誌上，但此時他是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臺北支局長。

123 鈴木讓三郎，〈國史より見たる——我が國の家庭〉，《臺婦》一月號（1935 年 12 月），頁 52–57。

124 如藤村志郎，〈秋夜偶感　愛情の種々相〉，《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23–24；〈春！學窓を巣立つ女性就職座談會〉，《臺婦》三月號（1936 年 3 月），頁 40–47。

125 〈JFAK 女性放送者列傳〉，《臺婦》三月號（1936 年 3 月），頁 14–18；〈大日本勇婦團女角力樂屋咄〉，《臺婦》一月號（1935 年 12 月），頁 69–73；〈1936 年の女子スポーツ界展望〉，《臺婦》一月號（1935 年 12 月），頁 162–164。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資料庫

性身姿。[126]換言之，「大眾取向」的內容並未在雜誌方針改變後立即消失，出版者及其人際網絡的力量，和讀者對雜誌產生的作用力，以各據一方的形式並存。

（三）「轉向」戰爭動員：「非常時期」與國防色彩的出現

古賀就任社長後，教化的色彩再次加重，但仍維持一定程度的大眾化路線。不過，從 1936 年五月號開始，雜誌風格出現了巨大的轉變。這一號的雜誌封面標示為「天長節號」，除了刊登總督中川健藏（1875–1944）、總務長官平塚廣義（1875–1948）等人的天長節祝文之外，還增添了許多「非常時期」色彩的文章，如〈迎接非常時期的天長節〉、〈關於婦人服裝的國防色化〉、〈非常時期與女性〉等等。[127]緊接著六月號又命名為「始政紀念號」，同樣刊登官員們的始政紀念祝詞。

數個月前接下總編，並撰寫〈臺灣婦人界將往何處去〉的藤瀨，在五月號的〈編輯室〉中，話中有話地寫道：「編輯態度大大改變，如大家所看到的雜誌這般。」在這一期的編務完成後，藤瀨離開雜誌社，留下「並非有特別的理由，完全是個人的因素」、「過去有許多因為我而愛讀臺婦的讀者，對這樣的讀者真的很可憐」這些耐人尋味的字句，[128]顯示其離職與編輯方針的轉變有關。藤瀨離職後，雜誌開始縮減大眾化路線的篇幅，七月號開始，不再刊登原本極受歡迎的「愛讀者文藝」欄，並重新公告文藝募集規則。[129]

《臺婦》刪減愛讀者文藝專欄，同時增添「非常時期」色彩，與外部情勢的變化及雜誌內部的主動性有關。在外部情勢的部分，1936 年 2 月底發生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後取得陸軍內部主導權的統制派，主張強

126 〈口繪〉，《臺婦》十二月號（1935 年 11 月），無頁碼；〈口繪〉，《臺婦》一月號（1935 年 12 月），無頁碼。

127 原題為〈非常時の天長節を迎へて〉、〈婦人服の國防色化に就いて〉、〈非常時と女性〉，《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22、24–27、34–37。

128 〈編輯室〉，《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172。

129 〈社告〉，《臺婦》七月號（1936 年 7 月），頁 195。

臺灣大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化軍部內的統制，以建設高度國防國家。二二六事件後的 1936 年 5 月，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並強化軍部對政治的發言權；陸海軍訂定「國策的基準」，並推進大規模軍備擴張的政策。[130]這一連串的事件改變了時局，可以說是日本的轉折點，情勢變化的浪濤也波及臺灣。1936 年 7 月，以「國民精神作興」為目標的「民風作興協議會」在臺灣召開，並作成宣言。會議中，軍部強硬要求廢止漢文欄，並對宣言內容提出修正案——要求貫徹執行「民風作興運動」的對象，在原本的官衙、學校、銀行、會社等機關團體外，更增加了「新聞」（報紙雜誌）。[131]

《臺婦》方針的改變，在時間點上，正處於二二六事件後時局改變之時，卻又稍早於民風作興協議會。若對比其他報章雜誌廢止漢文欄為 1937 年 4 月之後，可以推斷雜誌路線的變化，也攸關雜誌內部的主動性。如前所述，古賀位處在臺日本人社會上層，與官方往來密切，1936 年 10 月至 1940 年 3 月之間，她更擔任「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評議員」，[132]顯示她積極協力國家政策的個人立場。「古賀三千人之夫人」的身分，讓她得以透過上層社會的網絡接觸更高層的官員；而「臺灣婦人社」社長的身分，足以左右雜誌的發展方向。

在對國家政策採取協力態度的社長領導下，《臺婦》積極呼應外在情勢之變化。1936 年五月號，雜誌記者訪問臺灣軍經理部的池田二等主計正，並將談話內容整理成〈關於婦人服裝的國防色化〉，宣導國防色應普及於國民生活中。[133]同號雜誌上也刊登〈非常時期與女性〉，呼籲女性必須認識「非常時期（非常時）」。[134]「非常時期」一詞在 1931 年

130 中村隆英，《昭和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3），頁 185–215。

131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研文出版，2009），頁 209–213。

132 大橋捨三郎編，《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41），頁 729。

133 池田二等主計正談，〈婦人服の國防色化に就いて〉，《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24–27。

134 緒方武歲，〈非常時と女性〉，《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34–3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洲事變後成為常用語，意味著「時局重大」，需要「舉國一致」。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非常時期」更成為流行語，表現了對外的危機意識。[135]在殖民地臺灣的報章雜誌上，滿洲事變後也經常可見「非常時期」一詞；不過，在 1936 年 4 月以前的《臺婦》中並不那麼常見，自1936 年五月號起「非常時期」一詞才頻繁出現。

《臺婦》營造「非常時期」的色彩，進入 1937 年以後更加濃厚。1936 年 12 月，日本退出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隔年（1937）一月號的雜誌上，接連刊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1879–1962）、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1884–1949）的「年頭之辭」。[136]同號開始，雜誌結束原有的長篇小說〈貞操日記〉和幽默小說〈戀愛的有聲電影（恋のトーキー）〉之連載，二月號起更中止了前年底預計介紹「本島在住女流作家」的計畫。[137] 1937 年一月號的〈編輯語〉寫道，迎向新年新希望，「本誌脫離一般新聞媒體的軌道，改為沿著教化的路線」，「社員一同在『日本古來婦德涵養』的旗下精進」。[138]「一般新聞媒體」指的是通俗、大眾取向的婦人雜誌，也是《臺婦》過去曾嘗試靠近的路線。

在「非常時期」色彩加重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臺婦》與軍方的關係非比尋常。1936 年 5 月之後，除了上述提及的文章、年頭之辭外，陸續可見軍方關係者的撰文，呼籲女性在戰時肩負國防任務。[139] 1936 年 11 月，臺灣婦人社舉辦防空演習會，普及防空思想，過程中亦可見軍方的參與、指導、支援，臺灣軍司令部參謀長荻洲立兵、航空參謀北島熊男

135 金原左門、竹前栄治編，《昭和史〔増補版〕　国民の中の波瀾と激動の半世紀》（東京：有斐閣，1989），頁 108–115。

136 畑俊六，〈年頭の辭〉，《臺婦》一月號（1937 年 1 月），頁 4–5；荻洲立兵，〈無條約の第一年を迎へて〉，《臺婦》一月號（1937 年 1 月），頁 6–7。

137 〈お斷り〉，《臺婦》一月號（1937 年 1 月），頁 118；〈編輯後記〉，《臺婦》二月號（1937 年 2 月），頁 166。

138 〈編輯室便り〉，《臺婦》一月號（1937 年 1 月），頁 222。

139 如鈴木一三（陸軍步兵中佐），〈臺灣在住の日本婦人に與ふ——戰時防衛と婦人〉，《臺婦》十一月號（1936 年 11 月），頁 58–63；荻州立兵，〈婦人に告ぐ！〉，《臺婦》二月號（1937 年 2 月），頁 36–3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96–1965）皆出席致詞。[140]荻洲立兵正是前述民風作興運動時軍部強力提出修正案的重要人物，修正案加入的內容即包含了普及國防思想。[141]古賀在雜誌主辦的防空演習會上，清楚提到防空是國家總動員計畫的一部分，並強調女性在其中肩負重要任務。[142]雜誌社更在 1937 年五月號和六月號編輯「空襲和家庭」特集，教導主婦們在面臨警戒、空襲管制，又或被不同武器攻擊之際，應如何應對與獻身。[143]可以說，《臺婦》與軍方合作，將女性編入國家總動員計畫之中。[144]

值得注意的是，1937 年以後雜誌顯現的軍事色彩，恐怕已不再只是雜誌方主動的協力，也參雜軍方柔性的指導。日本本土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官方開始強力指導、監視雜誌的發行。[145]然而在殖民地臺灣，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的 1937 年 4 月開始，官方就已經以協商的方式干涉報章雜誌，要求廢止漢文欄。[146]這種協商、指導的行跡，也在《臺婦》上清楚可見。1937 年四月號的〈編輯後記〉寫道：荻洲前參謀長拜訪雜誌社，「親

140〈燦として臺灣婦人運動史を飾る——千六百人の婦人防空演習〉，《臺婦》十二月號（1936 年 12 月），頁 45–50；北島熊男，〈防空と婦人〉，《臺婦》十二月號（1936 年 12 月），頁 50–56。雜誌在創刊初期為了強調自身具有社會責任，也曾刊登臺灣軍守備隊司令官外山豐造（1880–1937）宣傳軍方舉辦防空演習的文章，不過軍方關係者的文章在 1936 年 5 月之前並未頻繁出現，與雜誌的關係也尚未如此密切。參見柿沼文明，〈創刊號を世に送りて〉，頁 72–73；外山豐造，〈空を守れ〉，《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94–95。

141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頁 209–213。

142 〈燦として臺灣婦人運動史を飾る〉，頁 45–50。

143 臺灣婦人社編，〈空襲と家庭（上）〉，《臺婦》五月號（1937 年 5 月），頁 54–58。

144 儘管《國家總動員法》在 1938 年 4 月才公布，不過日本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有國家總動員的相關言論與構想，1927 年即成立資源局，作為籌備機關，在之後陸續制定要綱，並展開國家總動員計畫。參見森靖夫，《国家総動員の時代：比較の視座から》（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

145 三鬼浩子，〈戦時下の女性雑誌——一九三七～四三年の出版状況と団体機関誌を中心に〉，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五年》（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頁 14–43。

146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頁 209–21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讓我們聆聽他對臺灣的一般婦人問題、對本誌的親切意見」。[147]原本就已對官方採取合作態度的《臺婦》，在此時更接受軍方的「親切意見」，清楚地透露與軍方之間的雙向協力關係。

在外部情勢轉變與內部的主動性，以及與軍方的雙向協力關係下，《臺婦》從 1936 年中開始，變身為時局的協力者與傳聲筒。中日戰爭爆發後，更持續強調女性在家內支持男性、培養第二國民的「賢妻良母」角色，以及在「非常時期」應有的犧牲、滅私奉公等精神。[148]除了精神上的教化之外，也實質指導女性在戰時的防衛部署、訓練，以及戰時體制下的家庭經濟和生活改善，如儲蓄、節約、獻金，廢品活用、廢除虛禮等等。[149]這類性質的內容，在戰爭的推展下，有增無減，一直到現存最後一期的 1939 年六月號。國家總動員體制下，《臺婦》成為動員女性的重要媒體。

（四）夭折的「大眾」：讀者來函所見的女性形象

在古賀就任社長（1935 年 10 月）到風格明顯改變（1936 年 5 月）之間，讀者來函顯示小說、隨筆、「愛讀者文藝」欄、戀愛花邊、家庭記事依然是讀者們喜愛的內容，雜誌社舉辦的童話會（お話会）、講演會也頗受歡迎。[150]

147 小島倭佐男，〈編輯後記〉，《臺婦》四月號（1937 年 4 月），頁 138。

148 相關文章甚多，茲列舉數例：小松吉久，〈國民精神總動員と婦人の力〉，《臺婦》十二月號（1937 年 12 月），頁 2–7；山本運一，〈非常時に於ける日本女性〉《臺婦》十二月號（1937 年 12 月），頁 40–44；山本運一，〈國史上に於ける良妻賢母〉，《臺婦》一月號（1938 年 1 月），頁 48–52。

149 如：古賀千代子，〈婦人の防衛部署〉，《臺婦》八月號（1937 年 8 月），頁 1；〈防衛訓練と婦人〉，《臺婦》八月號（1937 年 8 月），頁 12–14；佐久千代子，〈時局と主婦の消費經濟に就て〉，《臺婦》十一月號（1937 年 11 月），頁 12–13；牛尾竹之助，〈戰時體制と家庭經濟〉，《臺婦》五月號（1938 年 5 月），頁 4–12；小澤太郎，〈國家經濟は家庭經濟から　國家總力戰と銃後の生活〉，《臺婦》九月號（1938 年 9 月），頁 8–15。

150 〈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98–99；〈愛讀者は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雜誌風格遽變後，讀者來函則透露對雜誌內容變化的不滿，以及女性讀者的實存樣態：

> 讀者諸姊們！我的朋友們喧擾批評臺灣婦人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自己是從本月號開始成為愛讀者，請多多指教。是內容相當充實的書呢。但是，我希望能成為一本更明亮美麗的書，姊姊們覺得如何呢？請大家多多投書，使之成為我們良善的機關雜誌。（後略）（T 子）
>
> ……
>
> 本月號雖然刊登了一些詩歌，但還很不足呢。讀者諸姊們！應募如何？請大家奮起投稿吧！「聯合艦隊臺灣訪問記」太難了，我難以理解，各位姊姊們呢？刊登一些讓人充滿興味、有趣的內容如何？白石保先生「菜單一月表」看起來都是非常美味的料理，每天都很期待嘗試。下次還請介紹「甜點的作法」。比起嬰兒的洋服，如果有很棒、適合我們的和洋裁，還請介紹。（後略）（由紀子）

儘管讀者來函往往經過編輯挑選，但仍顯露讀者的感受與看法。第一則來函顯見來函者身邊的同儕們對於雜誌內容的變化感到不滿，並「喧擾批評」；第二則來函者更明白表達內容變得艱澀難懂。兩則都希望借以「姐妹」互稱的讀者之力改變雜誌的內容。期待刊登「有趣的小說」、「隨筆、小品、短篇」以及點心和洋裁作法等實用記事，則是許多讀者共同的心聲。[151]

此外，當雜誌的論說排斥外來思想的「戀愛」，強調日本家族制中女性的犧牲精神時，讀者們又追求何種理想女性形象？1937 年四月號的〈女人哀愁　懸賞當選發表〉提供一個有趣的線索。這是由《臺婦》和國際館聯合評選，刊登 10 位讀者觀看成瀨巳喜男（1905–1969）執導的

きたより〉，《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92–93；〈婦人サロン〉，《臺婦》十二月號（1935 年 11 月），頁 98–99；〈愛讀者通信〉，《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169。

151 〈愛讀者からのお便り〉，《臺婦》十月號（1936 年 10 月），頁 175–17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電影《女人哀愁》後的感想。讀者或強調女性自身的意志，或感嘆日本家族制度下媳婦的淒慘，也有人在觀影後「更加知道愛情力量的偉大」，並批判電影中丈夫「疼愛」妻子是視妻子為「物品」，是「奴隸的對待方式」，並強調「雙方必須是平等的人格與人格的結合」。[152]這些感想都集中在對日本家族制度的批判、對愛情的禮讚，並強調對女性人格的尊重等等，明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女性解放運動論述的影響，與前述排斥自由戀愛的論說背道而馳，也與論者一再強調的傳統家族制度、犧牲的精神相反。這顯示掙脫傳統的束縛，才是女性讀者們追求的理想樣貌。

由上可見，雜誌方雖然宣傳「非常時期」應有的犧牲奉獻等精神，但在讀者身上卻感受不到這些氛圍。相反地，享受大眾文藝、喜愛實用記事，偏好慰安、娛樂性質的報導，依然是 1937 年 6 月以前讀者的主要樣貌。

1937 年之後，《臺婦》刊出讀者來函的次數寥寥可數，讀者的樣貌也開始出現變化。雜誌自 1936 年走回教化路線後，發行量一路下滑，從 1935 年十二月號的 5,300 部，到 1936 年十二月號減少為 3,099 部，1937 到 1939 年更驟減至一千部上下（1,297、993、1,400 部）。[153] 1936 年 4 月以前的大眾化路線，應是雜誌最受歡迎，也是銷售最佳的時期，之後逐漸遠離「大眾」，1937 年之後更成為少數女性的讀物。在 1937 年之後少許的讀者來函中，偶爾仍可見鍾情於小說，希望喜愛的連載不要停刊的讀者；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期待雜誌扮演循循善誘的角色，以及

152 〈女人哀愁　懸賞當選發表〉，《臺婦》四月號（1937 年 4 月），頁 104–108。

153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年　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九統計書》，頁 154；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一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8），頁 116；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二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一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9），頁 110；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三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二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40），頁 110；臺灣總督府企劃部，《昭和十四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企劃部，1941），頁 104–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非常時期」相關內容表達感佩的讀者們。[154] 1937 年十月號，雜誌曾以「如果我是男人」為題募集讀者回應，這些回應多是：女性無法上戰場，但有守護家庭的本分；女性可以透過儲蓄、獻金貢獻國家經濟、以千人針表現銃後的赤誠等等。[155]這些也是雜誌在進入戰爭時期後反覆宣傳的內容。讀者的聲音反映了戰時體制下，仍持續購讀《臺婦》的少數讀者之身影。

結　語

本文以複眼的方式檢視《臺婦》如何在外部環境與內部多重行動者的力量下誕生，隨著出版者的更易與時局的變化轉換路線，並在不同目的下形塑理想的女性形象。外部環境，包含日本帝國空間與殖民地社會的雙重結構，其中有著商業雜誌在帝國版圖中的流通、殖民地社會教化運動的推展，以及「非常時期」下的戰爭動員。而雜誌內部的行動者，則包含了雜誌的出版者、在臺日本人的社會網絡、出版之際考量的潛在讀者，以及出版後實存的讀者們。

從外部環境的雙重結構來看，隨著日本雜誌輸入臺灣，大眾化的商業女性雜誌廣受歡迎，卻也引起殖民地教育關係者的憂慮。《臺婦》便是在日本商業女性雜誌版圖擴張，以及殖民地社會教化運動熾熱推行兩相交錯的磁場中，高舉「兼顧大眾娛樂與殖民地教化」之旗登場。

創刊之初，雜誌創辦者柿沼文明周邊的人際網絡——新聞媒體人、地方官民、教育關係者，讓雜誌呈現十足的教化色彩。然而，在日本帝國版圖的閱讀市場中培養大眾品味的讀者們，給予的回饋是對通俗、娛樂、實用記事的期待。作為一份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雜誌，《臺婦》不

154 〈愛讀者だより〉，《臺婦》十二月號（1937 年 12 月），頁 107；〈讀者通信〉，《臺婦》五月號（1937 年 5 月），頁 148–149；〈愛讀者便り〉，《臺婦》新年號（1938 年 1 月），頁 124；〈讀者からのお便り〉，《臺婦》十一月號（1938 年 11 月），頁 122。

155 銀屋登美子等，〈ああ男なりせば〉，《臺婦》十月號（1937 年 10 月），頁 82–8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不在讀者的力量下走向大眾化。

不過，殖民地臺灣社會的女性「大眾」讀者人數有限，加上日本輸入女性雜誌的競爭，雜誌在個人經營一年多之後，開始仰賴大資本的挹注。而握有資本者，又與官方關係密切，致使《臺婦》再次走回教化路線。這次體現在雜誌中的，則是臺日人上層社會／資本家夫人古賀千代子，及其周圍的社會網絡——從柿沼經營時期的地方官民層級，向上延伸到總督府高層。隨著時局變化，雜誌在 1936 年 5 月之後，在內部主動性與軍方的指導下，逐漸轉向戰爭動員。交錯在雜誌背後的，是官方、軍方與在臺日本人資本結合的力量。

《臺婦》在這些多樣的行動者與內外部環境作用下，因應帝國發展與時局的需求，描繪理想的女性形象與特質。創刊之初，在「賢妻良母」的基調上強調日本女性應培養勤勞的美德，並在殖民地維護敬神崇祖的傳統家族制度。這類論述折射的是殖民地邊陲的「缺陷」，以及日本帝國向外擴張之際女性所需的品德。在兼顧大眾化的路線上，雜誌雖屢屢策劃職業婦女的採訪報導，然而記者描述的重點，依然是官方期待的勤勞女性形象。

在讀者力量下邁向大眾化後，雜誌也開始刊登女性解放運動的相關論說，呈現不同於「賢妻良母」的多樣女性形象。然而，雜誌在轉換經營者之後，論述的重點再次回歸「賢妻良母」的基調，並強調對天皇與國家的獻身與犧牲精神。此外，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雜誌開始營造「非常時期」的氛圍，並指導女性在國土防衛、戰爭動員上盡一己之力。然而，相對於論者們所推崇的犧牲精神，讀者追求的，則是掙脫家族制度束縛、尊重人格、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此外，迥異於「非常時期」醞釀出的嚴肅感，對通俗小說、實用記事感興趣的身姿，仍是實存的女性讀者樣態。不過，雜誌轉向戰爭動員之路後，讀者漸減，少數的忠實讀者也開始顯現遭收編於國家總動員體制的身姿。

企圖打進閱讀市場，同時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出版者，以及具大眾通俗閱讀品味的讀者們，這些圍繞著雜誌的多重行動者與人際網絡，在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期拉扯了「教化」與「大眾」兩條相對的路線，同時在日本帝國和殖民地社會雙重結構中產出多樣的女性形象。而無論是「教化」路線上期待的賢妻良母，或是「大眾」路線上報導的職業婦女，以及實存具大眾品味的女性讀者，看似性質相剋，卻又有著相互重疊或關聯之處——賢妻良母與職業婦人同樣被賦予勤勞的形象，而官方女子教育所欲養成的賢妻良母，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擁有閱讀能力、具大眾品味的讀者。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殖民地臺灣與婦女雜誌——形塑理想的殖民地女性、家庭與生活」（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2-087-MY2）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以〈日治晚期女性雜誌《臺灣婦人界》的出現——出版者與讀者們〉為題，發表於 2017 年 4 月 27 日臺大歷史系講論會，以及以〈植民地台湾と婦人雑誌——『台湾婦人界』からみた植民地女性像——〉為題，發表於日本臺灣學會第 20 回學術大會（2018 年 5 月 26 日於橫濱市立大學），感謝河原功先生、洪郁如教授，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 錄

表一 《臺灣婦人界》創刊號目錄

篇 名	作 者	欄 位
臺灣婦人界發刊に題す	臺北帝國大學總長 幣原坦	祝歌
發刊を祝して	小松吉久	祝歌
祝辭	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長 平塚茂子	創刊祝辭
臺灣婦人界の發刊に寄す	臺灣日日新報社長 河村徹	創刊祝辭
臺灣婦人界の發刊を祝す	臺南新報社 宮本一學	創刊祝辭
發刊の辭	主幹 柿沼文明	
ひとりなる戀	矢野峰人	
學校教育と家庭教育の協調	大場孫治（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長）	
在臺内地人娘の結婚難をどうする？	乙守たまを	
歐米の旅 エヂプト行	赤堀梅子	
共婚夫婦のかたる共婚座談會	出席者：小田原伯可夫婦、楊承基夫婦、黃登州夫人、劉明朝夫婦、柿沼主幹、政田記者	
働く婦人の戰線のぞ記	本誌記者	耳と手の職場
内外時事メモ	臺北圖書館長 山中樵	
卒業後の希望	臺北二女 永島節江、 靜修高女 蘇氏金蕊、 臺中高女 澁谷信子、 新竹高女 龜井芳子、 臺北一女 久保雪枝、 高等學院 水野タミ、 臺北三女 范氏台妹	女學生ルーム
（童話）金の壺	田村樹路（並ニ繪）	少年少女欄
（入選童話)マリが木に生りました	臺北市上奎府町 音成義夫	少年少女欄
（童謠）市兵衛爺さん	日高紅椿	少年少女欄
育兒講座	臺北醫院小兒科醫長 酒井潔	少年少女欄
節婦 林潘氏金環夫人	（本誌記者）政田靜枝	孝子節婦列傳
私の職場日記（入選三篇） 番界生活像	柿沼二三秋 選 竹東郡カラパイ 杉崎英信	創刊號特別募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篇　　名	作　　者	欄　　位
夜更けの店番 タイピストの職場	臺北市永樂町三の五七　柯劉氏蘭 臺北市錦町六二山田方　白樺ゆき	
カンカン帽子の恋	榎本眞砂夫（文並に絵）	漫畫漫文
臺北州教化聯合會の活動狀況に就いて	關川保	
朝早く墓前を淨める處女の集り——臺北女子青年團	本誌記者	
臺北五年	柴山武矩　插畫・山口充一	連載小說
ナンセンス實話		
屍婚	高雄市湊町四ノ一二　小島泰介	懸賞募集小說/西川滿選
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訪問記	本誌記者	女學校めぐり
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の此頃の行事		
初夏の御化粧について	ホシノ美容室　星野富美子	
料理講座	臺北第三高女家政科主任　田中シヅ	
パリ今夏の婦人流行服だより	鹽澤沙河	
女學校を出たばかりの方に向くワンピースドレス	吉見まつよ	手藝洋裁
廢物を再生さす　新手藝　ペンテツクス	ワスレナ會手藝教授所　宇田嘉代湖	
發行前旣に此の人氣	柿沼文明	讀者のルーム
短歌	柴山武矩選	
俳句	江上々零選	
俚謠	更家紀の子選	
詩	西川滿　選	
編輯室	二三秋生	

資料來源：《臺灣婦人界》創刊號（1934 年 5 月）。

說　　明：1. 雜誌卷首的目錄刊載的題目、作者有些較為簡略，此表依據該目錄並參照實際刊登的內容整理。順序依出現序。不含卷頭寫真、廣告與補白。

2.「欄位」為雜誌本身在目錄或內文中為該篇所做的性質標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整理自讀者來函的讀者名單

地 點（人數）	姓 名	出 處
基隆（4）	小川直馬、小園愛子、更家龜吉（瑞芳） 一讀者	資料 1、2、6
臺北（25）	松山正平、駒田孝吉、悅子（臺北市）、 大島てる、新榮女、來栖ヨシ、川端、潮*2、 はるみ（北門町）、幸子、SY、一愛讀者（官 吏妻子）、ハル・小川、T、T 生、田中穗、 一愛讀者、木下初子、夢エリカ、木下幸子、 柴田杜夜子、陳華培、睦子、水戶野光子	資料 1、2、5、 6、7、8、9、10、 11、12、14、18、 19
文山郡（1）	村田芳子	資料 14
宜蘭（1）	周氏桂鳳	資料 6
新竹（5）	羽生久子、野畑ゆう、金井みどり（新埔）、 新愛讀者、囃子	資料 1、2、6、 8
角板山（1）	YK 子	資料 5
苗栗（1）	松尾幸子	資料 1
臺中（13）	佐藤峰子、S 子（清水街）、S 子、よしか、 中村タツ、塚田弘仔、愛讀者、君島初子、 K 子、中山陽子、山本のぶ、峰島あや子、 祝美はる	資料 5、6、7、 8、9、10、11、 15
彰化郡和美庄內（1）	陳玉蕊	資料 1
南投郡草屯庄（1）	林涼子	資料 1
嘉義（2）	峰子、K・N 子	資料 6、13
臺南（6）	木下ノブ、野岡トキ、矢倉崢、みどり*2、 原深雪、北島令子	資料 5、6、9、 10、11、12、18
高雄（10）	鄭蔡氏連籍、加藤ひさ（高雄市）、大川節子、 川口靜子、松本エツ、峰子、塚田節子、 元松ヨシ、N 子、林氏音月	資料 2、4、5、 6、7、9、10、 12、13、19
屏東（4）	友崎五月、H・K 子、富元（恆春）、SK 子	資料 5、6、8
小樽雙葉高女內（1）	南條敏子	資料 3
廣島縣婦德高女內（1）	梶山フジエ	資料 3
群馬（1）	清水初江	資料 4
東京（2）	草島由紀子（本誌寄稿家）、T 子	資料 15、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　　點（人數）	姓　　名	出　　處
大連市（1）	郭淇氏悅治	資料 2
廈門（1）	陳謝氏卻	資料 3
海底電信船南洋丸（1）	胡井春雄*3	資料 1、4、10
（無地點）（14）	富美子、大森豐子、鶴丸光、T・H・子、一讀者、良子、木村孝二、マリ子、T 子、由紀子、K・A 子、講演會　旁聽者一人、一讀者、K 子	資料 3、4、7、8、10、13、16、17

資料來源：資料 1：〈發行前旣に此の人氣〉，《臺婦》創刊號（1934 年 5 月），頁 156–157。
資料 2：〈おたより〉，《臺婦》六月號（1934 年 6 月），頁 164–165。
資料 3：〈おたより〉，《臺婦》七月號（1934 年 7 月），頁 172。
資料 4：〈おたより〉，《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56–157。
資料 5：〈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七月號（1935 年 6 月），頁 86–87。
資料 6：〈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八月號（1935 年 7 月），頁 102–103。
資料 7：〈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頁 89。
資料 8：〈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十月號（1935 年 9 月），頁 98。
資料 9：〈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臺婦》十一月號（1935 年 10 月），頁 92–93。
資料 10：〈婦人サロン〉,《臺婦》十二月號（1935 年 11 月），頁 98–99。
資料 11：〈おたより〉，《臺婦》三月號（1936 年 3 月），頁 164–165。
資料 12：〈愛讀者通信〉，《臺婦》五月號（1936 年 5 月），頁 169。
資料 13：〈おたより〉，《臺婦》十月號（1936 年 10 月），頁 175–176。
資料 14：〈愛讀者より〉，《臺婦》三月號（1937 年 3 月），頁 162。
資料 15：〈讀者通信〉，《臺婦》五月號（1937 年 5 月），頁 148–149。
資料 16：〈讀者からのお便り〉,《臺婦》六月號（1937 年 6 月），頁 153。
資料 17：〈愛讀者だより〉,《臺婦》十二月號（1937 年 12 月），頁 107。
資料 18：〈愛讀者便り〉，《臺婦》新年號（1938 年 1 月），頁 120–124。
資料 19：〈讀者からのお便り〉,《臺婦》十一月號（1938 年 11 月），頁 122。

說　　明：資料 14、15 中，包含了懸賞獲獎者的來函感謝，以及一名長期投稿雜誌的讀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三　懸賞活動得獎者名單

地　　址	姓　　名	出　　處
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乞生醫院	蘇江謨	資料 1
臺北市榮町　松井吳服店內	川島健一	資料 1
臺北市文武町	熊谷壽朗	資料 1
臺北市榮町　ミノリ寫真場內	飯島民子	資料 1
高雄市堀江町	庄島ミヨ子	資料 1
嘉義市北門町	塙淳	資料 1
斗六郡莿桐公學校	林氏枝	資料 1
基隆郡雙溪公學校	陳氏月嬌	資料 1
屏東市榮町	蕭林氏惠	資料 1
新竹州新竹郡紅毛庄	黃慶恭	資料 1
臺北市建成町	大島元治	資料 2
基隆市義重町	水谷慶子	資料 2
基隆玉田市	入江紀久子	資料 3
汐止公學校六年	陳献章	資料 3
新竹市中壢郡楊梅	柯泉	資料 4
臺北市太平町	王氏月蕉	資料 5
虎尾郡西螺	河間金子	資料 5
高雄市鹽埕町	本田とし子	資料 5
七星郡汐止街	蘇學勝	資料 5
海山郡三峽庄公館後	陳氏汝	資料 5

資料來源：資料 1：〈懸賞新題〉，《臺婦》九月號（1934 年 8 月），頁 144。
資料 2：〈名答案比べ〉，《臺婦》十月號（1934 年 9 月），頁 146。
資料 3：〈名答案比べ〉，《臺婦》十一月號（1934 年 10 月），頁 160。
資料 4：〈前號懸賞　名答案比べ解答〉，《臺婦》一月號（1934 年 12 月），頁 148。
資料 5：〈前號懸賞（考へ物）解答〉，《臺婦》二月號（1935 年 1 月），頁 94。

說　　明：地址省略丁目、番地等較細的資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　1935 年九月號目錄

題　　名	作　　者	欄　　位
躍進號に題す	柿沼文明	
移轉のお知らせ	臺灣婦人社	社告
新時代の婦人	代議士　安部磯雄	
ヘリオトロープ物語り	原作者不明、吉屋信子女史譯、渡邊深雪記	詩
私の日誌の一頁	岡幸子（基隆）、保田政（嘉義）、岩上春枝（臺北）、濱田幸藏（臺北）、津久井せつ（臺中）、齊藤文子（彰化）	懸賞讀者投稿
隨筆	藤村志郎	
ステージの名花一輪　天華の戀愛生活	記者	
愛よとはに	橋本尚夫	大眾小說
競馬をめぐる女人群像		
兒童藝術聯盟と臺灣婦人界とのタイアップに就て		社告
スクールトピック　佛滅先生	（基隆市玉田町二ノ九七）黃氏寶桃	懸賞讀者投稿
音樂と婦人（其のニ）	一條眞三郎	特別寄稿
共稼ぎ御圓滿	井村貞夫作、西正世志畫	讀物／ユーモア小說
狂句から見た母と娘	關口泳孝	讀物
海の思ひ出　山の思ひ出	大津かほる（松山）、秀島みよし（臺北）、酒田茂（臺南）	懸賞讀者投稿
女子水泳家列傳		
琵琶藝術の勃興に關し　錦統原田風水氏と語る	一記者	
甲板の妖人	松浦泉三郎作、管野裕作畫	讀物／怪奇小說
常識新語		
經濟時事	竹本篁處	特別寄搞
嘉義農林に與ふ	一記者	
おしゃれの心理	（東門町）潮	
女性身の上相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　　名	作　　者	欄　　位
臺灣の專賣事業		
雨さんと風さん	香村ユリ	子供の頁
燕から貰った飛行機	田邨樹路	子供の頁／童話
少女詩　流れのさゝやき	香村ユリ	
きねん博覽会	（臺北老松公、三年）柯氏玉秀	子供の頁／綴方
博覽会	（馬太鞍公、四學年）ウナクラランン	子供の頁／綴方
マーク懸賞募集當選者發表	臺灣婦人界編輯部	
愛讀者はかきたより		
洋裁通信講習	兒玉イシ	
娘さん方の整容第一課		
おはなし會		社告
詩	西川滿選	
俳句	山本孕江選	
短歌	柴山武矩選	

資料來源：《臺婦》九月號（1935 年 8 月）。

說　　明：1. 雜誌卷首的目錄刊載的題目、作者有些較為簡略，此表依據該目錄並參照實際刊登的內容整理。順序依出現序。不含卷頭寫真、廣告與補白。

2. 「欄位」為雜誌本身在目錄或內文中為該篇所做的性質標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臺灣婦人界》，創刊號～1939 年六月號，臺北。(*Taiwan fujinkai.* First issue [May 1934] through June 1939, Taipei.)

「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編集委員会，《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藤澤：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同窓会みどり会，1998。(*Taihoku daiichi kōjo monogatari* henshū Iinkai, ed. *Taihoku daiichi kōjo monogatari*. Fujisawa: Taihoku daiichi kōtō jogakkō dōsōkai midori-kai, 1998.)

〈お伽噺集出版　柿沼二三秋君著〉，《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6 月 10 日，第 3 版。(“Otogibanashishū shuppan Kakinuma Fumiaki-kun cho.”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June 10, 1927.)

〈地方近事　宜蘭〉，《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4 月 25 日，第 4 版。(“Chihō kinji　giran.”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April 25, 1924.)

〈肩のこらぬ　娯楽もの全盛　島都臺北のみの読書界を打診〉，《臺灣新民報》第 842 號，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5 版。(“Katanokoranu gorakumonozensei tōto Taihoku no mino dokushokai wo dashin.” *Taiwan shimmimpō*, no. 842, June 25, 1933.)

〈柿沼文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 月 3 日，第 7 版。(“Kakinuma Fumiaki-shi.”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January 3, 1936.)

〈臺灣勸業無盡　新竹支店落成披露〉，《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33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Taiwan quanye wujin xinzhu zhidian luocheng pilu.”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January 25, 1933.)

〈讀書力を示す臺中圖書館の成績〉，《臺灣新民報》第 991 號，1933 年 11 月 22 日，第 6 版。(“Dokushoryoku wo shimesu Taichū toshokan no seiseki.” *Taiwan shimmimpō*, no. 991, November 22, 1933.)

力武和子，〈恩師の思い出〉，收入撫子会編，《遠き学び舎：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のあゆみ》，頁 206–208。東京：台北第二高女撫子会，1994。(Rikitake Kazuko. “Onshi no omoide.” In *Tōki manabiya: Taihoku shūritsu Taihoku daini kōtō jogakkō no ayumi*, edited by Nadeshiko Kai, 206-08. Tokyo: Taihoku daini kōjo nadeshiko kai, 1994.)

大橋捨三郎編，《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41。(Ōhashi Sutezaburō, ed. *Aikoku Fujin Kai Taiwan Honbu enkakushi*. Taipei: Aikoku fujin kai Taiwan honbu, 1941.)

山中圖書館長談，〈雜誌界は行詰ってる〉，《臺灣新民報》第 842 號，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5 版。(Yamanaka Toshokanchō dan. “Zasshikai wa ikizumatteiru.” *Taiwan shinminpō*, no. 842, June 25, 1933.)

田中一二編，《臺灣年鑑　大正十六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26。(Tanaka Kazuji, ed.

臺灣人文學報期刊資料庫

Taiwan nenkan: Taishō jūroku-nen. Taipei: Taiwan tsūshinsha, 1926.)

——，《臺灣年鑑　昭和四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29。(Tanaka Kazuji, ed. *Taiwan nenkan: Shōwa yon-nen*. Taipei: Taiwan tsūshinsha, 1929.)

——，《臺灣年鑑　昭和九年》。臺北：臺灣通信社，1933。(Tanaka Kazuji, ed. *Taiwan nenkan: Shōwa kyū-nen*. Taipei: Taiwan tsūshinsha, 1933.)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婦人と家庭》創刊號，1919 年 12 月，頁 2–3。(Yoshikawa Seima. "'Fujin to katei' hakkan ni tsuite." *Fujin to katei*, First issue [December 1919]: 2–3.)

泉風浪，《新聞人雜記》。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Izumi Fūryō. *Shinbunjin zatsuki*. Taipei: Taiwan fujinsha, 1940.)

陳淑英提供，〈古きよき日々と父母を偲んで　25 期陳淑英の亡き妹故陳淑君（第三高女が第二女中に変った第一期生）の遺書より〉，《台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會報》，頁 152–159。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2015。(Chen Shu-ying. "Furuki yoki hibi to fubo wo shinonde: 25-ki Chen Shuying no naki imōto Ko Chen Shujun (Dai san kōjo ga Dai ni jochū ni kawatta daiikki-sei) no isho yori." *Taipei disan gaonü xiaoyou lianyi hui huibao*, 152–59. Taipei: Disan gaonü xiaoyou lianyi hui, 2015.)

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Taiwan Daikan-sha, ed. *Saikin no Nanbu Taiwan*. Tainan: Taiwan daikan-sha, 192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Taiwan Sheng Xingzheng Zhangguan Gongshu Tongji Shi, ed. *Taiwan Sheng wushiyi nian lai tongji tiyao*. Taipei: Taiwan sheng xingzheng zhangguan gongshu tongji shi, 1946.)

臺灣新民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Taiwan Shinminsha Chōsabu, ed. *Taiwan jinshi kan*. Taipei: *Taiwan shinminpō*, 1934.)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昭和十年　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九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7。(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ed. *Shōwa jū-nen Taiwan Sōtokufu dai sanjūkyū tōkeisho*.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1937.)

——，《昭和十一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8。(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ed. *Shōwa jūichi-nen Taiwan Sōtokufu dai yonjū tōkeisho*.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1938.)

——，《昭和十二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一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9。(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ed. *Shōwa jūni-nen Taiwan Sōtokufu dai yonjūichi tōkeisho*.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1939.)

——，《昭和十三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二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40。(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ed. *Shōwa jūsan-nen Taiwan Sōtokufu dai yonjūni tōkeisho*.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anbō chōsaka, 19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總督府企劃部，《昭和十四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企劃部，1941。(Taiwan Sōtokufu Kikakubu, ed. *Shōwa jūyon-nen Taiwan Sōtokufu dai yonjūsan tōkeisho*. Taipei: Taiwan sōtokufu kikakubu, 1941.)

遞信省工務局編，《遞信省海底電線布設船南洋丸建造概要》。東京：遞信省工務局，1926。(Teishinshō Kōmukyoku, ed. *Teishinshō kaitei densen fusetsusen Nanyōmaru kenzō gaiyō*. Tokyo: Teishinshō kōmukyoku, 1926.)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Kōnan Shinbunsha, ed. *Taiwan jinshi kan*. Taipei: Kōnan shinbunsha, 1943.)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Toyota Hideo, ed. *Taiwan shinbun sōran*. Taipei: Kokusei shinbunsha Taiwan shisha, 1936.)

二、近人研究

王湘婷，〈日治時期女性圖像分析——以《臺灣婦人界》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Wang Hsiang-ting. “Rizhi shiqi nuxing tuxiang fenxi: yi *Taiwan furenjie* weili.”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1.)

王琬葶，《世界・民俗・帝國——《臺灣婦人界》小說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Wang Wan-ting. *Shijie, minsu, diguo: Taiwan furenjie xiaoshuo yanjiu.* Taipei: Huamulan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 2018.)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7–55。(Liu Shu-chin. “Tongsu zuowei yizhong weizhi: *San liu jiu xiaobao* yu 1930 niandai Taiwan de dushu shichang.” *Zhongwai wenxue* 33, no. 7 [Dec. 2004]: 17–55.)

孫秀蕙、陳儀芬、王湘婷，〈再現「現代女性」——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的廣告圖像符號研究〉，收入吳詠梅、李培德編著，《圖像與商業文化——分析中國近代廣告》，頁 207–231。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Sun Hsiu-hui, Chen Yi-fen, and Wang Hsiang-ting. “Zaixian ‘xiandai nüxing’: Rizhi shiqi *Taiwan furenjie* de guanggao tuxiang fuhao yanjiu.” In *Tuxiang yu shangye wenhua: fenxi zhongguo jindai guanggao*, edited by Yong-Mei Wu and Peide Li, 207–31. Hong Kong: Xianggang daxue chubanshe, 2014.)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Chen Wen-sung. *Zhimin tongzhi yu ‘qingnian’: Taiwan zongdufu de ‘qingnian’ jiaohua zhengce*. Taipei: Taida chuban zhongxin, 2015.)

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249–290。(Chen Pei-feng. “Zhimindi dazhong de zhengduo: ‘Songbaofu,’ *Guowang*, *Shihuzhuan*.” *Taiwan wenxue yanjiu xuebao*, no. 9 [October 2009]: 249–90.)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Chen Shao-hs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iwan de renkou bianqian yu shehui bianqian. Taipei: Lianjing chuban gongsi, 1979.)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Yu Chien-ming. *Riju shiqi Taiwan de nüzi jiaoyu*. Taipei: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lishi yanjiusuo, 1988.)

——，《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Yu Chien-ming. *Riben zhimin xia de tamen: Zhanxian nengli, yinling Taiwan nüxing jiuye de zhichang nüxianfeng*. New Taipei City: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2022.)

楊 翠，《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Yang Tsui. *Riju shidai Taiwan funü jiefang yundong: Yi Taiwan minpō wei fenxi changyu (1920–1932)*. Taipei: Shibao wenhua, 1993.)

鄭涵云，〈殖民地臺灣的婦女雜誌《臺灣婦人界》之研究（1934–1939）〉。臺北：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Cheng Han-yun. "Zhimindi Taiwan de funü zazhi *Taiwan furenjie* zhi yanjiu (1934–1939)."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8.)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印刻文學，2010。(Zheng Hong-sheng. *Muqin de liushi nian yangcai suiyue*. Taipei: Yinke wenxue, 2010.)

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Yen Hsin-ju. "Shokuminchi toshi Taihoku ni okeru nihonjin no seikatsu bunka: 'kūkan' to 'jikan' ni okeru ishoku, henyō."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kyo, 2009.)

——，〈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3 年 12 月，頁 243–294。(Yen Hsin-ju. "Yu diguo de jiaobu jujin: Gaoqiao Jingzi de kuajie, waidi jingyan yu guojis yishi." *Taida lishi xuebao*, no. 52 [Dec. 2013]: 243–94.)

——，〈同為「改造」，各自表述——殖民地台灣商業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的誕生及其女性論述（1919–1920）〉，《新史學》第 31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頁 195–266。(Yen Hsin-ju. "Tongwei 'gaizao', gezi biaoshu: zhimindi Taiwan shangye nuxing zazhi *Furen yu jiating* de dansheng jiqi nuxing lunshu." *Xin shixue* 31, no. 2 [June 2020]: 195–266.)

三鬼浩子，〈戦時下の女性雑誌——一九三七～四三年の出版状況と団体機関誌を中心に〉，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五年》，頁 14–43。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Miki Hiroko. "Senjika no josei zasshi: 1937–1943 nen no shuppan jōkyō to dantai kikan-shi wo chūshin ni." In *Sensō to josei zasshi: 1931–1945*, edited by Kindai Josei Bunka-shi Kenkyūkai, 14–43. Tokyo: Domesu shuppan, 2001.)

山本禮子，《殖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99。(Yamamoto Reiko. *Shokuminchi Taiwan no kōtō jogakkō kenkyū*. Tokyo: Taga shuppan, 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村湊，〈大衆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アジア認識〉，收入川村湊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7　文化のなかの植民地》，頁 107–136。東京：岩波書店，1993。(Kawamura Minato. “Taishū orientarizumu to Ajia ninshiki.” In *Kindai Nihon to shokuminchi* 7: *Bunka no naka no shokuminchi*, edited by Kawamura Minato et al., 107–36. Toky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1993.)

中村隆英，《昭和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3。(Nakamura Takafusa. *Shōwa-shi*. Tokyo: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1993.)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の「大衆文学」〉，收入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7　台湾通俗文学集一》，頁 349–372。東京：綠蔭書房，2002。(Nakajima Toshio. “Nihon tōchi-ki Taiwan no ‘taishū bungaku.’” In *Nihon tōchi-ki Taiwan bungaku shūsei* 7: *Taiwan tsūzoku bungaku shū* 1, edited by Nakajima Toshio, Kawahara Isao, and Shimomura Sakujiro, 349–72. Tokyo: Ryokuin shobō, 2002.)

中嶌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婦人雑誌、その周辺——『婦人雑誌の夜明け』によせて〉，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婦人雑誌の夜明け》，頁 1–17。東京：大空社出版，1989 初版；2016 新装普及版。(Nakajima Kuni. “Kindai Nihon ni okeru fujin zasshi, sono shūhen: ‘Fujin zasshi no yoake’ ni yosete.” In *Fujin zasshi no yoake*, edited by Kindai Josei Bunka-shi Kenkyūkai, 1–17. Tokyo: Ōzora-sha shuppan, 1989; 2016 rev. ed.)

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婦人雑誌と女性たち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Kimura Ryōko. *“Shufu” no tanjō: Fujin zasshi to josei-tachi no kindai*.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2010.)

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係から〉，收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女性像をめぐって》，頁 64–86。東京：青木書店，2007。(Katō Chikako. “‘Teikoku’ Nihon ni okeru kihanteki joseizō no keisei: Dōjidai no sekai to no kankei kara.” In *Gende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in East Asia : discourses on the ideal woman*, edited by Hayakawa Kiyo, 64–86. Tokyo: Aoki shoten, 2007.)

永嶺重敏，《雑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Nagamine Shigetoshi. *Zasshi to dokusha no kindai*. Tokyo: Nihon edeitāsukūru shuppanbu, 1997.)

江刺昭子，〈吉屋信子〉，《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デジタル版（東京：小学館，1984）。(Esashi Akiko. “Yoshiya Nobuko.” In *Complete Japanese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Nipponica)*. Tokyo: Shogakukan, 1984. Digital edition.)

牟田和恵，〈新しい女・モガ・良妻賢母——近代日本の女性像のコンフィギュレーション〉，收入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タニ・バーロウ編，《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帝国・資本・ジェンダー》，頁 151–172。東京：岩波書店，2010。(Muta Kazue. “Atarashii onna, moga, ryōsai kenbo: Kindai Nihon no joseizō no konfigyurēshon.” In *Modan gāru to shokuminchi-teki kindai: Higashi Ajia ni okeru teikok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ihon, jendā, edited by Itō Ruri, Sakamoto Hiroko, and Tani Barlow, 151–72.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0.)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雑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2。(Satō Takumi. *Kingu no jidai: Kokumin taishū zasshi no kōkyōsei*.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2.)

坂本武人，〈安部磯雄の婦人論〉，《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第 13 期，1968 年 3 月，頁 92–122。(Sakamoto Taketo. "Isoo Abe's View of Women Problems." *Kirisuto kyō shakai mondai kenkyū*, no. 13 [March 1968]: 92–122.)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Lee Cheng-chi. "Taiwan kindai media-shi kenkyū josetsu: Shokuminchi to med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kyo, 2004.)

——，〈193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收入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恵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克》，頁 241–27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Lee Cheng-chi. "1930 nendai Taiwan ni okeru 'dokusha taishū' no shutsugen." In *Kioku suru Taiwan: Teikoku tono sōkoku,* edited by Wu Mi-cha, Huang Ying-zhe, and Tarumi Chie, 241–79.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2005.)

岡満男，《婦人雑誌ジャーナリズム》。東京：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会，1981。(Oka Mitsuo. *Fujin zasshi janarizumu*. Tokyo: Gendai janarizumu shuppankai, 1981.)

岩見照代監修，《「婦人雑誌」がつくる大正・昭和の女性像　第一巻　恋愛、結婚 1》。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Iwami Teruyo, ed. '*Fujin zasshi' ga tsukuru Taishō, Shōwa no joseizō: Dai-ichi kan, renai, kekkon* 1. Tokyo: Yumani shobō, 2014.)

河原功，〈三省堂と台湾——戦前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流通〉，收入氏著，《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頁 249–297。東京：研文出版，1997。(Kawahara Isao. "Sanshōdō to Taiwan: Senzen-ki no Taiwan ni okeru Nihon shoseki no ryūtsū." In *Taiwan shinbungaku undō no tenkai: Nihon bungaku to no setten*, 249–97. Tokyo: Kenbun shuppan, 1997.)

——，《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東京：研文出版，2009。(Kawahara Isao. *Honrō sareta Taiwan bungaku: Kenetsu to teikō no keifu*. Tokyo: Kenbun shuppan, 2009.)

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内海忠司日記　1928–1939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Kondō Masami, Kitamura Kae, and Komagome Takeshi, eds. *Utsumi Chūji nikki 1928–1939: Teikoku Nihon no kanryō to shokuminchi Taiwan*. Kyoto: Kyo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 2012.)

金原左門、竹前栄治編，《昭和史〔増補版〕　国民の中の波瀾と激動の半世紀》。東京：有斐閣，1989。(Kinbara Samon, and Takemae Eiji, eds. *Shōwa-shi* [Supplemented Edition]*: Kokumin no naka no haran to gekidō no hanseiki*. Tokyo: Yuhikaku, 1989.)

前田愛，《近代読者の成立》。東京：筑摩書房，1989。(Maeda Ai. *Kindai dokusha no seiritsu*. Tokyo: Chikuma shobō, 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　博、社會心理研究所，《大正文化 1905–1927》。東京：勁草書房，2013；1965 年初版。(Minami Hiroshi and Shakai Shinri Kenkyūjo. *Taishō bunka 1905–1927*. Tokyo: Keisō shobō, 2013. 1965 First ed.)

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Ko Ikujo. *Kindai Taiwan josei-shi: Nihon no shokumin tōchi to 'shin josei' no tanjō*. Tokyo: Keisō shobō, 2001.)

宮崎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お茶の水書房，2008。(Miyazaki Seiko. *Shokuminchi Taiwan ni okeru seinendan to chiiki no hen'yō*. Tokyo: Ochanomizu shobō, 2008.)

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98。(Fukaya Masashi. *Ryōsai kenbo shugi no kyōiku*. Nagoya: Reimei shobō, 1998.)

森靖夫，《国家総動員の時代：比較の視座から》。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Mori Yasuo. *Kokka soudouin no zidai: hikaku no siza kara*. Nagoya: Nagoya daigaku shuppankai, 2020.)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Tsai Chin-tang. *Nihon teikoku shugi-ka Taiwan no shūkyō seisaku*. Tokyo: Dōsei sha, 1994.)

齋藤美穂，〈婦人雑誌における身の上相談〉，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大正期の女性雑誌》。東京：大空社，1996 初版；2016 新裝普及版。(Saitō Miho. "Fujin zasshi ni okeru mi no ue sōdan." In *Taishō-ki no josei zasshi*. Edited by Kindai Josei Bunka-shi Kenkyūkai. Tokyo: Ōzora sha, 1996; 2016 Rev. ed.)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Fujii Shozo. *Taiwan bungaku kono hyakunen*. Tokyo: Tōhō shoten, 1998.)

Lin, Pei-yin. "Progressive or Immo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odern Girl in Print Media of 1930s Taiwan." In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edited by Sumei Wang, 28–45. Leiden: Brill, 2021.

Wang, Shin-fen. "Japanese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in the 1930s: Their Identity 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by Analyzing *Taiwan Fujinkai*." In *Women in Asia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edited by Tatsuya Kageki and Jiajia Yang, 114–32.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Wang, Sumei. "Mass Media and the Modern Girl in 1930s Colonial Taiwan." In *The East Asian Modern Girl: Women, Media and Colonial Modernit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 edited by Sumei Wang, 10–27. Leiden: Brill, 2021.

三、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Institute of Taiwanese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zongdufu zhiyuanlu xit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ccessed March 10, 2023.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鄭麗榕，〈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歷史學柑仔店》，2015 年 9 月 25 日，2023 年 3 月 10 日檢索。https://kamatiam.org/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Cheng Li-jung. “Guanyu yizhi heigou yu jiazu, zhanzheng jiyi.” *Lishixue Kám-Á-Tiàm*, September 25, 2015. Accessed March 10, 2023. https://kamatiam.org/關於一隻黑狗與家族戰爭記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5 (Jun. 2025), pp.113–176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3

From "Indoctrination" to "Mass Orientation" and Its "Turn"—*The Taiwan Women's World (Taiwan Fujinkai)*, Its Publishers and Readers, and the Creation of Female Imagery

Yen, Hsin-j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women's magazine *The Taiwan Women's World*（*Taiwan Fujinkai*）, first published in colonial Taiwan in 1934,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contexts and multiple internal actors, underwent shifts in its editorial direction, and contributed to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ideal woman.

View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colonial Taiwanese society, the magazine was launched during an era marked by the influx of Japanese commercial women's magazines into Taiwan and the promotion of a social educational campaign. In this intertwined context, the magazine emphasized a balance between mass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education. However, its content leaned heavily towards indoctrination rather than entertainment, failing to satisfy readers who had cultivated a popular taste in the imperial reading market. Shortly after its inception, the magazine shifted toward a mass-market orientation under pressure from readers. Nevertheless, follow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a subsequent reorganization, its publication fell under the control of a capitalist's wife with official affiliations, which led t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319, Taiwan, R.O.C.;
E-mail: yenhsinju@nt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return to an indoctrination-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evolved, the magazine eventually collaborated with the military, turning toward wartime propaganda and serving as a medium for national mobilization.

Throughout its vari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magazine oscillated between the distinct paths of indoctrination and mass orientation, producing a diverse range of female imagery. Among thes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the image of the wise wife and good mother advocating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structures reflected the peripheral status of colonial society. Simultaneously, calls to foster the virtue of diligence were aimed at addressing perceived deficiencies in colonial social norms. By contrast, letters from readers revealed a preference for popular literary content, an interest in romantic topics, and a depiction of women readers who sought respect for their individuality.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how changes in the magazine's content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female imagery emerged from interactions among male media professionals, female "mass" readers, the capitalist's wife with official ties, and the dual influences of imperial and colonial forces that surrounded them.

Keywords: women's magazines, Kakinuma Fumiaki, Koga Chiyoko, commercial publishing, Japanese colonial er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